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 “《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红楼梦》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红楼梦》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是写“四大家族”，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生命。《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读了《红楼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叫封建社会。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中，在谈到《红楼梦》时，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至多呢？他没有说。这说的是1964年8月18日以前，那么，从这往后，他还有没有再读《红楼梦》呢？如果有的话，又读了多少遍呢？读者对这些一定是很想知道的。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王行娟在她著的《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他们就这样谈着谈着，不觉东方已经发白，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这段文字可以表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也就是早在1928年之前，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为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都极为熟悉。

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逢先知（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给毛泽东兼管图书报刊近17年）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50年代和60年代，逢先知的记载是这样的：

1958年7月1日，主席要：

《诗韵合璧》

《唐诗别裁》

《明诗别裁》

《古诗源》  
《初唐四杰诗集》  
《楹联丛话》、《续楹联丛话》  
《西厢记》（戏本——王实甫本）  
《红楼梦》（送原本《红楼梦》）  
《金瓶梅》（送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注：于上午8时交高智。高智是当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61年9月28日送主席：

《文选》（胡刻大字本）共24册。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湾中央印制厂影印）共2册。

1963年2月6日，主席要：

《脂批红楼梦》  
《英语学习》杂志全套（7日送）

1966年夏往后，直到70年代，关于毛泽东要看《红楼梦》，我们的记载如下：

1966年11月20日，送主席：

《渔洋山人分甘余话》	1—2册
《钢罍斋随笔》（六、七）	2册
《越漫堂詹詹录》	1—2册
《狂言》	1—2册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1—4册

1967年4月2日，送主席：

《红楼梦》（2函共20册）  
《清史稿》（9函共131册）

1968年7月11日，送主席：

《红楼梦》（120回本）	1—24册
《红楼梦》（80回本）	上、下册
《红楼梦》（120回本）	1—4册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上、下册

1969年9月28日，送主席：

《红楼梦》道光壬辰版  
1—24册

《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 24 年版

2 函 16 册

1970 年 6 月 27 日，送主席：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4 册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1962 年版	1—2 册
《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 26 年版	1—16 册
《石头记》（120 回本）	4 函 32 册
《增评补图石头记》（120 回本）	4 函 32 册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商务印书馆影印）	1—8 册

1971 年 6 月 9 日，送主席：

《增评补图石头记》（商务印书馆版）	1—16 册
《增评补图石头记》（道光壬辰刻本）	1—16 册

1971 年 6 月 10 日，送主席：

《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戊戌石印本）	1—16 册
--------------------	--------

1971 年 8 月 4 日，送主席：

《红楼梦》（道光壬辰刻本）	1—24 册
---------------	--------

1972 年 5 月 24 日，送主席：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1—4 册
------------------------	-------

1973 年 3 月 9 日，送主席：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1973 年 4 月 4 日，送主席：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	--

1973 年 5 月 26 日，送主席：

《红楼梦》等 4 种新版古典小说各 1 部	
-----------------------	--

以上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读后让我们退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在整理翻阅他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的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红楼梦》，还有各种平装本《红楼梦》。笔者曾作过一次统计，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装本《红楼梦》一共有 20 种之多。这 20 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生前有没有一一读过，我们还不能肯定。但这些书，每次都是他自己提出要看，让我们去借或购买来的。

这 20 种《红楼梦》是：

- 《增评补图石头记》（木刻大字本） 4 函 32 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1 函 8 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6 回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1 函 8 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80 回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1 函 8 册
-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 中华书局
- 1963 年版 1—12 册
-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73 年版 2 函 20 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文学古籍刊行社
- 1955 年版 1 函 8 册《原本红楼梦》 有正书局版
- 《红楼梦》 道光壬辰年版 1—24 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上、下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甲戌 16 回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4 册
-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评）1961 年版 1—2 册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俞平伯评）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4 册
- 《全图增评石头记》 上海求志斋光绪戊申年版 1—16 册
- 《原本全图红楼梦》 1—16 册
- 《绘图评注石头记》（王希廉评）道光壬辰版 1—2 册
-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湾中央印制厂影印）
- 1—2 册
- 《增评补图石头记》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1—16 册
- 《增评补图石头记》 道光壬辰年版 1—16 册
- 《增评补图石头记》 光绪戊戌年上海石印 1—16 册

还有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红楼梦》。

以上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红楼梦》，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 册）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 册）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有的是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红楼梦》，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红楼梦》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反正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句，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镫而去”的话，等等，他老人家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的描写。如1951年秋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类似这样有关《红楼梦》具体细节描绘的谈话是很多的。这一小小的侧面，也能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读得是很熟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爱读《红楼梦》？笔者认为，第一，因为他推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他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很为欣赏。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他写的文章和与人谈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现实问题。例如，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特别是王熙凤说过的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很感兴趣，在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时候，曾多次引用这句话。1958年，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用丫头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作者曹雪芹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对清朝乾隆时代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由盛到衰的真实生动的细腻的描绘，成功地刻画了几十个封建统治者和数百个奴仆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对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同类作品中更为突出。毛泽东爱读《红楼梦》，这与《红楼梦》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独到的艺术成就是不能分开的。第二，是因为《红楼梦》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的同时，体现了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的传统。【1958年8月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一文时加的话】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

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的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这是《红楼梦》区别于其他古典爱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之所以爱读《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是要通过读《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清乾隆年间，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曹雪芹的笔下着重描写的只是贾府一个家族。透过贾府一家，看到史、王、薛各家，从贾、史、王、薛四家看到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就如同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中所说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通过读《红楼梦》，就可以从贾府衰败过程中一系列真实、形象、生动的片断画面来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毛泽东在1965年对他的表孙女王海容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81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直到1973年12月21日，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他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贾雨（假语）材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

《红楼梦》除了具有上述的这些特色外，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他这样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重要的是要读历史，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封建社会作出分析，通过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认识、了解封建社会。但是，仅读这些书还不够，还应当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和统治者与奴隶等人们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更细致地了解封建社会。事实证明，许多的文艺作品读后，能使人收到读理论书、读历史书收不到的效果。毛泽东爱读《红楼梦》，大概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吧。

毛泽东曾对《红楼梦》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是这样说的：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

不起来”。毛泽东这里把《红楼梦》作为我国文学的代表作，作为我国文学的主要的成就，固然是以幽默的语气谈及的，但他确实也从内心里因此引以自豪。《红楼梦》是我国文学的成就，也是世界文学的成就。其作者曹雪芹如同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一样，是他们各自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对于这样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毛泽东一直是读了又读，爱不释手。

毛泽东是怎样读《红楼梦》的呢？在管理图书过程中，我们知道，反反复复地读，是毛泽东生前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他不仅自己反复读，而且还多次劝身边的同志、劝其他各方的同志要反复读。毛泽东是怎样反复读《红楼梦》的呢？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两则小故事。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起床之后，入睡之前，饭前或饭后，常到住地附近去爬山，他老人家游兴很高，一边爬一边与陪同在身边的同志谈笑风生。他对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侯波当时很年轻，她的话音一落，毛泽东便接着问：“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了。因此，侯波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侯波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毛泽东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侯波回答说：“我一遍还没有看完哪。”“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的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把《红楼梦》当作故事看，这是看小说的初浅层次。对一般文化的读者也“只能看看故事”罢了。

还有一次，时间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著名将领许世友说：

“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

毛泽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面对许世友，露着笑容。许世友以善战著称，习文不足，他对毛泽东给予的评价心悦诚服。

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1989年第1期）

上述的两则小故事中，对读《红楼梦》，毛泽东都说“要看五遍”。在其他的各种场合，他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五遍”。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多次听他说过：“《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一遍又一遍地反反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

---

《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绛、灌，分别是西汉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她的妻子吕后逐渐掌权，大有以吕氏取代刘氏之势。吕后死，周勃与陈平采取措施除了诸吕，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周勃对巩固汉刘政权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直到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参考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因为他读得多，所以对书中的人物、故事等都很熟悉，许多精彩的内容、富有哲理的语言，还有许多的诗句，他都记得烂熟，能脱口而出，引用自如。从50年代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秉忱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谈及他的这一特点。陈说，在“三反”的时候，毛泽东常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陈还对我们说过，毛泽东在访苏的时候，还用林黛玉说的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报告、谈话、讲话中看到，毛泽东很习惯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思，引用最多的大概就是《红楼梦》了。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反复读《红楼梦》，不是仅看书中的故事、语言艺术，而更重要的是看阶级斗争，看政治斗争，看社会历史。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种主要方法。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红楼梦》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967年10月12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不了解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小说了，它进到了读小说的更深层次。也是对读小说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人的读小说，只注重小说本身的人物、故事等情节的描写。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透过小说描写的字里行间看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从历史的视角来读小说，这对读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是什么意思呢？笔者的理解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应当弄清楚《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历史背景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书中的内容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通过阅读，透过故事，明白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

对《红楼梦》的写作背景，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把曹雪芹和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大作时的思想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因此，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

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刘汉民编写《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封建社会制度必然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红楼梦》则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客观必然性。封建制度的“天”是无法补的，曹雪芹主观上想“补”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主观上的希望和封建社会家族必然衰败的客观结果的矛盾，《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萌生的新的希望和他们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的束缚还是以悲剧性命运告终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红楼梦》中通过一件一件的具体事实和一个个的故事、一场一场的人物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文学作品的意义上来说，《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佼佼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上来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6页）“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它又是一部历史小说和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所以，毛泽东一直把《红楼梦》当作“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来读。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第二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红楼梦》不是直接描写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专著，它主要描写的是封建社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内部的冲突及其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时，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斗争。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其阶级等级和身份也就是“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是泾渭分明的。“四大家族”衰败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中也是很为明显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对《红楼梦》里写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多次谈及。早在井冈山时，他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贺子珍的路》，第115页）在延安时，毛泽东一次与身边的同志谈读《红楼梦》时，他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还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

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在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说到这里，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又接着说：“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知道吗？……”（薛焰：《光辉的形象，亲切的教导》，《广州文艺》1977年第5期）

说到《红楼梦》第四回中的“护官符”和这部书中写阶级斗争的事，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对《红楼梦》第四回中描写四大家族的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他记得很熟，和身边的同志谈《红楼梦》时，他常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笔者还看到，毛泽东在读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这几句话的天头上，他用黑铅笔划了三个大圈。在这几句话后：“雨村……细问这门子，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这一段文字旁边，他用铅笔都一一划了圈。毛泽东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红楼梦》全书的纲，大概也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宝，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一法宝来剥削、欺压平民百姓，来剥夺和占有奴隶们用汗水和血创造的财富。这个“纲”最能体现作品的主题并能引导读者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阶级斗争”，就是抓住了作品的主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整个作品的钥匙。所以，毛泽东读《红楼梦》很关注这个“纲”，他与人谈《红楼梦》时谈得最多的大概也是这个“纲”。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红楼梦》，来理解《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独到之处。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还有一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读《红楼梦》。

《红楼梦》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细节的描写不是很多，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谈到：“《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中，当然也包括经济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对平民百姓和奴隶们的剥削、侵占等主要的表现也应当是在经济方面。然而，《红楼梦》中“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这是因为作者曹雪芹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的着重点不在这个方面。尽管作品中关于经济问题的描写不是很多，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都一一注意到了。对于这一点，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有关谈话中有所谈及。根据当时有关人员的记录，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读文学作品，对类似这样的话，人们一般是不太关注的。读《红楼梦》时，除专业研究人员外，一般人员对上述有关土地买卖的话也是不会关注的。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了有关的话，还能够随口背出来。由此可见，毛泽东读《红楼梦》与读马列著作、读历史著作、鲁迅著作一样，是一丝不苟的。

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红楼梦》，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三十三）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提到的“胭脂米”做了考证。作者一共摘引了四种古籍中的有关记载，这里笔者照原书抄录如下：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云：

浙、闽总督范公时崇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食馔，内有朱红色大米饭一坛，传旨云：此本无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迥异他禾，及登剖子，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广获其米，一岁两熟，祇供御膳。

此康熙时人记康熙时事；后如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页十一亦云：

康熙二十年前，圣祖于丰泽园稻田中，偶见一穗，与众穗迥异，次年命择膏壤以布此种，其米作微红色，嗣后四十余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间不可得也，其后种植渐广，内仓存积始多。世宗时河东总督田文镜病初愈，尝以此米赐之，作粥最佳也。

记此最详者当属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一页十，有一段云：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种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中略）曾颁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

《永宪录》卷一页三十二一条云：

其供御膳曰御稻米，出京师西山，颗粒长巨味香，更有一种可长成树，每年结实，其色鲜红，品又（缺字）御稻上。是年（按康熙六十一年）冬曾以示大臣，分赠之，则往籍所未闻者。——乃种于御苑——云：树上天生者白如粘米，与朱红分两种。

当然是“一云”之说分红白两种为是，因康熙自记赠督抚织造者即红米，而非树上生也。《张文端公全集》卷七页五十二云：“集畅春苑，谢赐御谷种。公同诸大臣具奏恳恩颁给广种，奉旨每人给二石，赴瀛台领讫，具奏谢恩。”可见织造曹家确曾与诸大臣领此米种，雪芹非夸又明。然观其一年之间，仅获二石，红粥一碗，丰餐凤姐，则其珍罕亦可见矣。景梅九《石头记真谛》卷上页七十一云：“惟御田胭脂米为丰润县所产，据友人云：‘共四十八顷，其米长寸许，红色，在前清纯系贡品，庶民不得尝云。’其意盖以此证明《红楼梦》所写为皇室也；不知曹家食用，多同内庭，已见上举。……其米盖玉田种，后始产于御苑，雪芹作‘玉田胭脂米’，亦当日实名也。胭脂米，俗名‘红粳子’，色粉红，作粥饭入口有异香。”

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与《红楼梦》有关的“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红楼梦》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的视角读《红楼梦》的一个佐证。

总之，《红楼梦》包含的内容是极为深广的，既描绘了封建家族一段家庭和爱情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又写了封建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阅读这部小说，既可以看到书中描绘一个个生动、细腻的爱情故事，又可以看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我们从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实际情形和有关读《红楼梦》的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几十年中，毛泽东读《红楼梦》主要是把它作为“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来读的。通过一遍又一遍地读《红楼梦》，从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衰败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和了解明末清初这一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把小说当作历史读，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这样读小说的。恩格斯早在1884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就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463页）列宁也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上的著名的作家，其主要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是通过历史事件、家庭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列宁把托尔斯泰看成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把他的小说都当作历史来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读《红楼梦》不仅仅是从历史这一个视角，他对书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等也很有兴趣，很为关注。大概就是因为每次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去读《红楼梦》的，所以，他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收获，越读越爱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随时结合书中的人或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来说明一些实际问题。例如，1951年秋天的一

个夜晚，毛泽东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有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说到毛泽东读《红楼梦》，这里笔者向读者介绍一点毛泽东批注《红楼梦》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我们知道的线装版本就有20多种。毛泽东辞世后，在整理他的图书时，对这2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笔者都曾逐一翻阅过。其中只有两种版本用铅笔圈划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划了道道，有的是划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这些道道、圈圈、点点，都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随手所划的，圈划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划。圈划是阅读的标志。但是没有圈划的不能说他就没读过。因为我们知道，他读过的许多图书都没有圈划的标志。毛泽东很爱读《红楼梦》，也很爱谈《红楼梦》。可是，我们保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批注过的上千册的图书中，批注的《红楼梦》我们没有见到过。是毛泽东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的流失在外呢？现在还难下断语。

毛泽东生前不仅爱读、爱谈《红楼梦》，而且也非常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工作。

说到毛泽东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我们还是从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谈起。这封信，毛泽东是这样写的：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导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

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虽然没有公开，传达的范围也很小。但是信的精神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学术界、艺术界宣布了。

这封信开头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

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毛泽东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划，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毛泽东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本文作者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写的批注是：“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文章中有四五处毛泽东还划了问号。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文史哲》发表后，《文艺报》第18期被指定转载时还加了编者按。《文艺报》编者按写道：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还写道：“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这个编者按，毛泽东逐字逐句阅读过。他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的关于文学批评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辨》中卷第21页，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俗语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这一段话旁边写的批注是：“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了这一段话之后写了一条批语：“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也加了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个按语，毛泽东读后很不满意。他在阅读李、蓝文章时，针对这个按语挥笔写下了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

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等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两个编者按为什么都不满意呢？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两种报纸对《红楼梦》研究的新旧两种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轻此重彼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俞平伯撰著的《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早在1952年就公开出版了。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成果的基本总结，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艺报》1953年第9号在“新书刊”一栏特意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推荐语中写道：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而在这之前，即1952年11月，白盾写了一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题目叫《〈红楼梦〉“怨而不怒”的吗？》。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寄给《文艺报》后，很快就被退回来了，该报的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等等。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他们起初是寄给《文艺报》的，被置之不理，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才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主要是因为“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实现。因为有这样的具体情况，再加上《文艺报》对批评俞平伯持保留态度，《光明日报》把李、蓝的批评文章仅仅看作“不成熟的试作”，所以，毛泽东读了《文艺报》和《光明日报》上述的两个按语很为不满，因此，在阅读李、蓝上述两篇文章，含情疾书，写下了上述的一系列批语。

50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红楼梦》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是只是读了《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著作。这三种著作是：

《红楼梦辨》	俞平伯著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年版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著	棠棣出版社	1953年版
《论〈红楼梦〉》	何其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这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这部《红楼梦辨》，毛泽东批注、圈划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笔者向读者简略地介绍如下。

重新改装本第一册，包括原书的：

- 顾序
- 引论
- 上卷
- (一)论读书底不可能

- (二)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 (三) 高鹗续书底依据

重新改装本第二册，包括原书的：

上卷

- (四) 后四十回底批评
- (五) 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中卷

- (六) 作者底态度
- (七) 《红楼梦》底风格

重新改装本第三册，包括原书的：

中卷

- (八) 《红楼梦》底年表
- (九) 《红楼梦》底地点问题
- (十) 八十回后底《红楼梦》
- (十一) 论秦可卿之死（附录）

重新改装本第四册，包括原书的：

下卷

- (十二) 后三十回的《红楼梦》
- (十三) 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
- (十四) 《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
- (十五) 唐六如与林黛玉（附录）
- (十六) 记《红楼复梦》（附录）
- (十七) 劄记十则（附录）

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里笔者就着重介绍这一册的批注和圈划情况。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

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

毛泽东为什么说《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呢？我们还是先看毛泽东在本书“第六、第七节”上的批划情况吧。

本书第六节标题是“作者底态度”，就在这一节的第5页上，作者俞平伯写了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毛泽东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7页，在“一切叙述情事，皆只是画工底后衬，戏台上底背景，并不占最重要的位置”这句话旁边也划上了竖道，在与这句话相对应的天头上，毛泽东也用铅笔划了一个大问号。第8页开头的

一句“《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第9页“或由于往日欢情悉已变灭、穷愁孤苦不可自聊，所以到年近半百才出了家”这一段文字旁边也粗粗地划上了道道，与这段文字相对应的天头上，也划了一个问号。第12页倒数第2行“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呢？“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第15页，“因此凡他们以为是宝钗一党的人——如袭人、凤姐、王夫人之类——作者都痛恨不置的。”毛泽东不赞成俞平伯的这种看法，在相对文字的天头上划上了一个问号。第15页：“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俞平伯的这段话，特别是前面的“痛骂”和后面的“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的说法，毛泽东是不赞同的，在文字旁边都划上了问号。第16页：“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这一句话中的“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10个字旁，毛泽东都划上了竖道，划上了问号。第17—18页：“既以为是人家底事情，贬斥讪谤自然是或有的；但若知道这是他自己底事情，即便有这类的事，亦很应该‘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啊。”这一段话旁边，毛泽东除划上道道外，也划上了问号。第18页，作者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从后四十回看宝钗袭人凤姐都是极阴毒并且讨厌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七节“《红楼梦》底风格”。这一节，毛泽东划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划了七八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其中的几处。

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也就是这本书第21—22页，作者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接着上述的这一小段，作者对《红楼梦》的一些评价，如：“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等等，这些评价，毛泽东也都用铅笔划上了粗粗的道道和问号。在这一节的第29页，作者写道：“《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毛泽东对“拘束于事实”、“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等的看法，都划上了竖道和问号。对“都是”两个

字，毛泽东大概是认为作者说得太绝对了，所以，他在这两个字旁又单独划了一竖道和一个问号。

第32页，作者写的一大段话：“《红楼梦》开罪于一般读者底地方很多，最大的却有两点：(1)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袞，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一个风流儒雅的美公子，一个十不全的傻大爷；如此等等，不可胜计。……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他们开了一下玩笑。

《红楼梦》底人物，我已说过都是平凡的。”从批划的几种符号来看，毛泽东对作者的这一段对《红楼梦》的看法是不赞成的。就在这一大段后边，作者还有一些看法和观点，如认为贾宝玉“不是社会上所赞美的正人”，“十二钗都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竟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毛泽东在这些看法的文字旁边都划上了竖道和问号。

第38页，作者认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还引了江顺怡的《读红楼梦杂记》一书中的两句话：“《红楼梦》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笔者根据批划的种种符号来分析，毛泽东对作者的这一观点是不赞成的。

第六、第七两节，毛泽东划问号的地方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介绍了。毛泽东说俞平伯著的《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七两节”。划问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作者“错误思想”表现的地方呢？当然这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毛泽东的批注，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学术研究是允许有不同看法的。红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新旧红学家的不同观点。所以，对毛泽东的看法自然是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除第六、第七两节外，后面各节，毛泽东也作了不少的圈划。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如下的两处：

第十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第116页，原著作者写有这样一段话：

“这个一年前的困难光景，到现在还是依然。宝钗底结局究竟原本是应当如何的，我可以说是无所知。依八十回底大势推测，宝钗似乎终于和宝玉成婚。但后来文情，有无局面突变这类事情发现，实在不能悬想。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线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我想，如婚事将成，而局面突变，在文章上也是一格；但不知道八十回后有这么一回事吗？”

这一段话，原著上共有5行。就在这段话的上方，毛泽东划了一个大问号，在5行的顶部还画了一粗横线。这段话中的“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结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一句旁边，毛泽东还划了一条粗粗的波浪线，句尾还划了一个大圈。问号、横线、浪线及圈圈等，都表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说法是不怎么赞成的，至少是有疑问的。

俞平伯著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笔者注）是‘寓意讥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毛泽东读后，每一行都用铅笔划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划了一横线，横线上还划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

《红楼梦辨》这部书，毛泽东批划的地方还有许多，笔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红楼梦辨》是1923年出版的。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陈秉忱曾对笔者说过，50年代年，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曾把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重新改装过。（去掉精装本硬皮，把原一册分装成3册或4册，加上牛皮纸封面——笔者注）《红楼梦辨》的改装本式样与此也差不多。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辨》改装本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批注的字迹，也像似50年代写的。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批读《红楼梦辨》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否应当在50年后期以前。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已经批读过《红楼梦辨》和其他有关的研究、评论《红楼梦》的著作，对《红楼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他看到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和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就很有兴趣。并由此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封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一开始就肯定李、蓝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后来，毛泽东一直很关注《红楼梦》的研究，有关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书刊，他是很爱看的。这里笔者再介绍两个例子：

1962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吴世昌的一篇题目为《脂砚斋是谁？》的文章。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又发表了吴世昌的另一篇题目为《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均选自吴世昌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这篇长文，“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的两节。“东风”副刊发表时在文后特意加了一个小注，说明这个情况。吴世昌当时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这两篇文章，连同文后的小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看后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经与《光明日报》社的同志联系，真的确有全文。吴世昌的这个全文是刊载在《光明日报》社编印的一份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充一份。（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难忘的回忆》，第236—237页）看了节选的文章，还一定要看全文，这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不是一般的关注。

说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还有一个事例，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那次谈话中，对《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轮廓，他还作过一段独自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页）

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谈到新旧红学家，这在当时的红学界，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次谈话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之前，已经非常用心地阅读过这些红学家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红学”研究与评论文章。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50年代改名《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读批划的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王昆仑的“红学”研究的著作有《红楼梦人物论》。他的这部人物论，是他解放以前的研究成果，1962年重新修订，在《光明日报》上逐篇连载，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6页）

“何其芳也写了个序”，这个“序”是指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的一篇长序。从毛泽东上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这篇序。何其芳还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何其芳在本书的序中说：“《论红楼梦》是我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是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本书毛泽东看得很细，从序到注释的文字，他看后都留下了许多批划的标志。

吴世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探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他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所以，毛泽东把他列入新红学之列。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所谓“索引派”，就是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种研究《红楼梦》的思路毛泽东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

胡适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红楼梦考证》。他的“新红学”观点，毛泽东说“比较对一点”。所谓“比较对一点”，最主要的是“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谜的界限，把《红楼梦》的研究扭转到着重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样研究《红楼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把胡适和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吴世昌都称为“新红学”的代表。

毛泽东读过的“新红学”和“旧红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连同他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爱读《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来评价《红楼梦》，这在我国“红学”史上可能还都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新、旧“红学家”都曾给予评价，但是对他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是有看法的。所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积极提出和阐明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把从胡适到何其芳这些红学家，都称为新红学家，但一次也没有谈及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红学家。

##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写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古典小说。《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水浒》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水浒》里梁山泊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

《水浒》是我国流传最广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也是毛泽东很爱读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那时，乡间能够借到的书，多半是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当他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这些小说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生动的斗争故事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读，一直要达到熟悉这些故事情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才放手。”（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说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水浒》等古典小说的事，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同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道：“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毛泽东自己曾回忆说过，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对这部生动地描写农民起义造反的英雄群像的古典小说，他不仅自己爱读，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建议过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兴趣，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

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岁月里，毛泽东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论《水浒》和宋江造反的故事。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尽管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甚至饿着肚皮，《水浒》依然是他爱读的书籍之一。在长征途中，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急于要找《水浒》一读。对此，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黄友凤后来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

毛主席喜好读书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在日行百里、饥困劳苦、战事频繁的长征途中也不例外。

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我们住进了一个地主的庄院。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散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浒》来，我想用用。”小战

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四处寻找起来……

我们仍在院子里唱歌。突然，从主席房间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惊诧地循声望去，只见那位找《水浒》的小战士提着个大水壶窘迫地站在主席面前，抓耳挠腮，主席单手叉腰，用爱抚的目光望着他，“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了把水壶，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尾嘛！”说完，主席自己又笑了……

事后，主席专门把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叫在一起，就错水壶当《水浒》这件事让大家展开讨论，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然而它是毛泽东长征途中要读《水浒》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不少的书，特别是哲学方面的书读得尤多。也读过一些小说，例如：《南北宋》（上海大新图书社印行）、《昭君和番》（上海新文化书社版）、《康圣人演义》（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明末痛史演义》（赵焕亭著，上海鸿文书局1936年印行）、《崇祯惨史》（上海新文化书社刊行）、《施公清烈传》（周梦蝶校阅，大达书局1935年再版）等。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过的图书，经过战争岁月的辗转，大部分都丢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管理图书工作中，对保存下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过的图书是分外珍惜的。但从中笔者没有看到《水浒》这部小说。到目前为止，笔者也没有看到谈及延安时期毛泽东读《水浒》的材料，仅此，也不能断定：延安时期，毛泽东没有重读过《水浒》。

延安时期，毛泽东谈到《水浒》、谈论《水浒》的材料是不不少的。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也经常引用《水浒》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或者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曾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来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是这样写的：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曾借用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故事，来说明我们应当如何对付反动派。他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认为在野兽面前，我们“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号召人们说：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逢先知同志当时的记载，1964年8月3日，主席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他送给毛主席的是影印贯华堂原

本。到了 70 年代，我们先后给主席送过 12 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按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 12 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	1——24 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	1——20 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 1924 年版	1——12 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	1——16 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1——4 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1——20 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 1975 年影印	1——8 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影印	1——100 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 1975 年影印	1——32 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版	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中华书局 1966 年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 1——20 册），他一直把它放在卧室里。

1964 年 8 月 3 日，逢先知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70 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一次是 1971 年 8 月 3 日，这天上午大约 10 点多钟，高碧岑告诉笔者，说首长要看《水浒》，要笔者赶快找出一部送去。高碧岑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一般干部。徐业夫生病后，组织上调他来接替徐秘书的工作。因为高秘书来到主席身边工作时间也不长，对主席读书的具体情况知道得也不细，所以这次主席要看《水浒》，他也不太清楚主席要看什么版本的《水浒》。我们给主席管理图书的时间也不太长。对主席读书的习惯和要求等我们更是知之甚少。不过《水浒》这部书笔者还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也读过。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我们很快在主席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当时笔者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送到了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交给了高秘书。从游泳池回到笔者的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笔者一拿起电话，高秘书仓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他要的是他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当时，笔者只知道有《水浒》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他的书房里。放下电话，急忙到主席书库。因为主席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所以，笔者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当时，主席的图书平装和线装是分开存放的。线装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一类的图书大多放在一起。管理图书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这主要是为查找使用方便。《水浒》和《红楼梦》等这些历史小说，我们记得当时一共放了满满的两个书柜。为了查找方便，书柜外面我们分别都贴有标签，一看标签就知道柜内放的是什么书。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我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查看。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的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

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找到了主席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我们将它急忙送交高秘书。心想：“这下不会错了！”高秘书说：“你们送来正好，首长在等着看呢。”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主席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所以这一次就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上一次主席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再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这一次，笔者把这部书送给他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我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此情况向主席汇报之后，主席让我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月3日，我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我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后一种，主席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主席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身。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就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了。不过，主席对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不满意的，他说金圣叹砍掉《水浒传》的后半部分“不真实”。对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较详细地介绍。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逝世。1月8日，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陈毅的悼词。1月10日下午，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的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来到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从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2月初，他身体还未康复，就要看《水浒》，看了《金圣叹批改水浒传》，还要看《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受“武松打虎”、“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三打祝家庄”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等许多英雄的故事的吸引呢？还是对这位英勇善战、功绩卓著、大度豁达、爽直忠诚的诗友遭林彪一伙的迫害之死而心中不平、不安、不忍，同时又对陈毅深情地思念呢？是要看小说、读故事，重温历史呢？还是要借此消除心中的不安，调节一下大脑呢？这里笔者也是难于说清的。反正，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矛盾的，也是非常寂寞、孤独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喜爱读《水浒》，到了晚年，还兴味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毛泽东在耄耋之年，多次颇有兴致地谈论《水浒》。直到1975年，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睛不能看书了，在与身边同志谈到《水浒》的时候，他还侃侃而谈一番。

毛泽东对《水浒》为什么这样有兴趣呢？这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浒》是一部与农村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紧密关系的古典小说。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代差不多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年5月至9日，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讲课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关注和着重研究的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为了动员农民，组织农民，1927年1月，毛泽东在大革命高潮中用了33天的时间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考察的基础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考察中，他看到不愿做奴隶的农民

们纷纷起来造反、抗争的情景：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用绳子把劣绅们捆绑起来，牵着游乡；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他们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打翻了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对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称之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生在农村，长时期地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很熟悉农村和农民的疾苦。他很憎恶当时那些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等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理解农民，同情农民，对农民和农民运动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写反映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的小说。书中描写并且颂扬的一个个英雄人物，有打渔的，有种菜的，有打铁的，有卖膏药的，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被压迫的普通贫民百姓。书中的人物面貌毛泽东好像都似曾相识；他们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种种行为，毛泽东似乎也有所闻、也有同感、也曾有所实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愿望，毛泽东好像也都是眼见过、耳听过、心想过。对于这样一部与农村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古典小说，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这是非常自然的。毛泽东自己生前在谈到早年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时说过：“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算是《水浒》了。“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

第二、造反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共鸣。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具有造反思想和强烈的反抗精神。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进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8页）

这段自我介绍，造反的矛头固然是对着他的父亲，但字里行间都显示出少年毛泽东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表现他勇于造反，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的例子是很多的。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斗争的岁月；从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诞生，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不失时机地用其智慧，奋力叩开关闭已久的中日、中

美关系的大门，谱写出中日、中美关系历史上的新篇章。

《水浒》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书中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敢于反抗官府的诸多的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何由分散的单个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直到最后完全被熄灭的农民反抗斗争的完整过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农民的反抗，都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浒》中众多的农民造反，众多的英雄投奔梁山泊，铤而走险参加起义，这是“官逼民反”的历史必然，这是《水浒》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毛泽东所以爱看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揭示的“官逼民反”的这一主题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具有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产生了共鸣。对书中许多的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等等，毛泽东是很敬佩和向往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高兴地给编导们写了这样热情赞誉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出戏，是《水浒》的精髓，体现了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誉，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泽东还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于社会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革命生涯，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还颇有感触地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第三，把《水浒》作反面教材。毛泽东晚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之余，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他不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审美享受，也不是像少年时代那样追慕英雄造反的故事，而是把《水浒》作反面教材，通过阅读这部反面教材，使人们知道如何发展和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75年5月29日到9月底，在中南海给毛泽东读书）谈《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时候，曾说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1974年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对张玉凤也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水浒》中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宋江

招安投降，这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历次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点，早在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就说过：“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625 页）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的政权，取得的胜利，能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断前进，人民已经夺取的政权还会不会丧失，中国还会不会重蹈“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历史覆辙，这是晚年的毛泽东极为关注而且一直在用心实践和探索的一个问题。在进城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饱含深情地说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8—1439 页）这段话，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曾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地前进。那么，到了 70 年代，已确定为我们党的接班人的林彪叛国出逃，刘少奇早已含冤离世，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住进医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紧锣密鼓，他们迫不急待地抢班夺权。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大力提倡“继续革命”，并要人们注意《水浒》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彻底失败的这一反面教材，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逻辑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还是要人们从宋江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的这一特定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从而能够“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毛泽东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来读，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心理背景。我们知道，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接受招安，不是在当时客观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毫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的大好形势下自愿主动接受招安的。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 60 年代以后一直思考和忧虑的课题，是很为一致的。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压迫害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毛泽东还联系到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他注意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在获得胜利以后，原来的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往往就逐渐消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渐丧失，图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后完全违背原来革命的真正目标，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历代革命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经过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心理背景，所以毛泽东把《水浒》后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写作为反面教材来读。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部《水浒》，半个多世纪，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读过多少次，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内容，他都熟记在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随口引用恰到好处。

毛泽东爱读《水浒》，这是很多读者都知道的。但是，毛泽东是怎样阅读《水浒》的呢？从少年时代到晚年，为什么他一直是常读不厌呢？对于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很多了。下面笔者就自己所闻所见，向读者作一简略地介绍。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阅读《水浒》，如同阅读《红楼梦》等其他的古典小说一样，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视角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人物的分析、问题的研究等着眼点和结果就可能不同。由于阅读的视角不同，理解不同，收效不同，所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那么，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去阅读《水浒》的呢？

哲学的视角。从哲学的视角读《水浒》，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特点。《水浒》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小说中有许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是毛泽东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毛泽东很为欣赏的故事之一。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曾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他在《矛盾论》中是这样说的：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作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1942年，毛泽东还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他的这个论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建国后在一次省市书记会议上向人们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时又说，“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1959年2月在省市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1957年11月上旬，在苏联莫斯科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将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名工作人员请来一道吃饭。在饭桌上，在谈论三国和“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之后，毛泽东忽然问翻译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三国》、《水浒》……”说到《三国》、《水浒》，毛泽东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他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水浒》里有辩证法，读《水浒》，主要是研究、理解故事里的辩证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大特色。

政治的视角。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从政治上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又一个特点。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从农村开始的。毛泽东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

民问题开始的。在进行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关注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问题和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早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当时，毛泽东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说明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当时他就举了《水浒》中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他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即为农民利益，因为毛泽东在当时的表述中对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还没有加以区分，他所表达的二者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笔者注），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运用《水浒》故事来印证或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

《水浒》是毛泽东读过多遍并且十分熟悉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时常引用《水浒》中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一点，薄一波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山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 1981年12月26日）

建国以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国家政权，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形势下，《水浒》中英雄好汉们的造反斗争精神和行为模式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仍然还留有深深的印记。1956年2月20日，一次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3页）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水浒》中英雄们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

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一次在谈时社会上刮的“共产风”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说道：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引注）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

毛泽东在这里把宋江等人取的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

土豪、分田地取的不义之财是一并加以肯定的。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对的，都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们的集体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要拿就拿，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事例是很多的。就拿重视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来说，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就这样说过：《水浒传》里若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物，梁山的事业就不行。又如，在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常常从读《水浒》中得到的启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就联系到《水浒》。他说：

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里物印象是多么深刻。毛泽东读《水浒》，别注意书中的一些细节和情节的描绘，善于从政治的视角分析人物和事物，从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引伸出一些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工作方式、方法的视角。毛泽东读《水浒》，对书中的有关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的描写也是很为关注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常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用《水浒》中谈及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来启发和教育人们，助人理解，使人受益。

1938年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一次有关保卫工作中的讲话中，为了提高人们对做好保卫工作的认识，他不是侃侃而谈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用《水浒》中的有关故事情节，像讲故事一样来启发人们。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这像家常聊天似的，将深刻的道理寓于通俗的谈话之中，使人听起来感到亲切，入耳，入脑。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的人在行动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往往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鲁莽处事，因此弄出许多错误。毛泽东把红军游击队里的这种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他说：

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李逵是《水浒》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这里毛泽东把游击队里的这些人比作“李逵式的官长”，既有批评的意思——批评他们在行动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鲁莽处事；又有肯定的意思——肯定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的错误属工作方法的问题。这样的批评，通过《水浒》中李逵这个英雄人物来加以说明，

寓批评于说理之中，这样就能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收到最佳的效果。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中，也能约略看出毛泽东独特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水浒》不是讲政策和策略的专著，但是，《水浒》中描写梁山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的是很讲政策，很注意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这个视角，采撷《水浒》中的有关的描写，融于我们的工作实际，启发和教育我们的同志。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其中的第七条主要是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他由此联系到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联系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秘密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什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阅读《水浒》，我们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谈话中可以看得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就用《水浒》上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三打祝家庄”，他颇有感触地说：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这一政策时，他又想到了《水浒》里梁山泊的例子。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哲学的视角，政治的视角，工作方式、方法的视角，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主要的视角。除这些视角外，还有社会历史的视角，经济的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的视角，等等，这里不再赘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客观环境，不同的革命斗争和不同的工作实际，毛泽东阅读《水浒》的视角是不同的。《水浒》固然不是百科全书，但是，毛泽东能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去解释，去运用。因此，往往起到阅读其他政治、理论读物起不到的作用；收到阅读其他政治、理论读物收不到的效果。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重要原因。

说到毛泽东晚年阅读《水浒》的事，自然就要说到毛泽东在1975年关于《水浒》的一段谈话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是这样的：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写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著名的谈话，不是毛泽东自己撰写而反复斟酌修改的关于《水浒》评论的专论，也不是“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意义”的最新指示，更不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的动员令。它是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平常的闲谈。据我们所知，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到了1975年下半年，他已经显得很衰老了。他说话已难听清了。那些日子，他日常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看书，而且差不多都是倚在床上看书。看书看得时间太长了，工作人员就扶他在屋里走一走，或请他坐在会客厅沙发上休息一下。因为他终生酷爱读书，也很爱谈书和评书，所以工作人员扶他走动或陪他休息时，聊天和闲谈差不多也总是以书为话题，用书来引起他的兴趣，达到让他休息和调节的目的。这段有关《水浒》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当时有关这段谈话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8月13日，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来专门给毛泽东读书的芦荻老师来中南海已经两个多月了，由于经常给主席读书、和主席谈书，所以，她和主席也比较熟了，谈吐也就比较随便了。这天，芦荻老师和主席交谈中，她看主席谈兴很浓，就向主席请教了她曾研究和关注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我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谈论这些古典小说，主席当然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他读得多，了解的多。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小说，接着又侃侃而谈了《水浒》。和主席交谈，主席很喜欢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说明你入境了，说明你动脑了。主席也非常有兴致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芦荻来自教学第一线，又是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所以，她和主席交谈中，常向主席请教和提出一些问题，主席也很有趣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有时主席在回答之前，还常让她先说说对所提出问题的看法。在主席谈《水浒》中，芦荻借机向主席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接着，主席便谈了上面这段后来发表的评论《水浒》的话。

毛泽东对《水浒》的这段谈话，当时没有录音，是芦荻后来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回忆整理的。对这件事，芦荻说：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意思。

既然是一次平常的闲谈，又“并没有别的意思”，后来为什么又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呢？风波又是怎样被平息的呢？

芦荻整理毛泽东上述对《水浒》的谈话，当天就传到了姚文元那里。这

不足 300 字的谈话，引起姚文元的格外关注。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还提出把毛泽东的这次关于《水浒》的谈话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宣传、理论、思想、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的本来是一次平常的谈话，经姚文元这样与政治斗争与现实思想战线的斗争一联系，立即就成了开展评《水浒》运动的“最新指示”了。为开展评《水浒》运动推波助澜，姚文元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量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它算作“农民局限性”，这等于抹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起义和投降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因此，“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防修反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姚文元的提示和引导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两大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评 水浒》；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的题目是《重视〈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题目是《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些文章紧按姚文元定的调子，大张旗鼓地弹唱起来：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以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等等。在姚文元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就这样一浪胜过一浪地蔓延开来了。

梦寐以求当女皇的江青，一看有机可乘，机不可失，最后也赤膊上阵了。1975年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本来这次会议与江青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也没有通知她参加这个会议。可是她突然窜到大寨。会上，邓小平强调整顿，这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含沙射影攻击身患绝症一直住在305医院的周恩来总理，以及邓小平。9月17日，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在大寨私自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清华、北大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又一次煞有介事地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

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还说：“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本来，这次会议主题很明确，可是江青偏要求在这次会上放她的与本次会议毫无关系的上述有关评《水浒》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使得会议难以正常进行下去。华国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针对江青的话说：“放屁，文不对题。”并指示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又对邓小平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你不必跟她计较。”（东方骥编《落日余晖—毛泽东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这样，已经掀起的评《水浒》的一股逆流才告平息。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水浒》，而且还劝别人读《水浒》。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时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去武汉时，他还把他最爱读的那部影印线装本的《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带在身边，一边读，一边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论《水浒》。“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慧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的一种评论。”（《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页）也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是得当的，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的这些评论，“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70页）江青、姚文元之流，借机大做政治文章，完全是一种阴谋，妄图借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让江青上台执掌大权，实现女皇美梦。

毛泽东不仅爱读《水浒》，而且也很关心对《水浒》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水浒》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过。他的存书中，有一本《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编辑出版），这本书中茅盾著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毛泽东阅读的时候，还用黑铅笔在书上划了许多的道道。

据笔者的记载，毛泽东最后一次向我要《水浒》，是1975年8月22日，这一天下午，他指名要看《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一名《忠义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73年12月影印，每部两函20分册）。本来，这种《水浒》1973年12月14日我们已经送了两部给他存放在游泳池住地，可是，由于游泳池住地存放的书太多，当天他要看一时又找不出来，所以让我们再送一部给他。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看书。这部《水浒传》大概是他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要看的第一部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仍然是非常喜爱的。毛泽东这次要看《水浒》，是在与芦荻谈《水浒》后的第9天，而且是在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视力稍有恢复的时候，是因为他对《水浒》的评论言不尽意呢？还是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呢？反正他又一次要看《水浒》，而且要看的是100回本的。

说到这里，笔者又想到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1975年9月8日上午，芦

荻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找一本《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论文集》，说本书上有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芦荻还要我们找中央党校当时编的《关于宋江的历史材料》，教育部理论组编的《教育革命简报》增刊第8、9期（内部发行本），说本刊上有关于评论《水浒》的文章和材料。当天笔者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上有张政烺写的《宋江考》一文。中央党校编的《关于宋江的历史材料》和教育部理论组编的增刊也都分别向他们要来一份。晚饭后，书和材料一起交给了芦荻。1975年9月底，芦荻在离开中南海以前，她曾给主席医疗组的人员讲了怎样理解毛主席评《水浒》的课。她这次向我们要的书和材料，是她自己为讲课做准备的呢？还是主席要看的呢？还是主席另有什么意思呢？这些我们就不清楚了。

后来，笔者在毛泽东阅批过的书刊中，还看到过一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1975年第11期）。这一期杂志上刊有署名为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方毛泽东用黑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划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封面刊名上方毛泽东用红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显然，本期杂志和罗思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晚年毛泽东的注意。如果说毛泽东阅读过或者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过这篇文章，那也是1975年11月或者11月之后的事了。

### 《三国演义》“令人喜读”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薄一波在《回忆片断》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三国演义》就是毛泽东很喜欢看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之一。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本书叙述的故事是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到王濬平吴结束。该书着重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结构宏大，作者笔下描写的众多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叙述的故事文字通俗，情节曲折，虚（指作者的艺术创造）实相间，动人心魄，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佳品。

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说过，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爱看《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对于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除了他本人说的之外，我们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读《伦理学原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批注中也能看出来。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时所写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人揽史是，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6 页）

这段批注可以说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爱看《三国演义》。

如同《红楼梦》、《水浒》一样，《三国演义》也是毛泽东很为喜爱和很为关注的一部古典小说。

说到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笔者先向读者介绍毛泽东自己曾讲过的一个故事。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毛泽东一到井冈山，立即带领部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在这次讲话大约五个月之后，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毛泽东提倡读三部中国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多么的喜爱。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同样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为这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6页）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做报告中，常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当时的实际问题。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他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建国以后，直到60年代，毛泽东还常引用《三国演义》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用他那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独到的语言艺术，把自己置于听的人当中，平等相待，融为一体，因此，每次都能把深刻的道理用平常的言谈表达出来，

收到新的效果。

1953年6月3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必须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时，毛泽东向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一段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人物，其中诸葛亮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也是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常常提到的历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说到50年代毛泽东在谈话、讲话中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的事，当时任毛泽东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年第11期第26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

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三国演义》描写的许多历史故事、战例，差不多都是取材于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人们熟知的《三国志》，与司马迁著的《史记》、班固著的《汉书》、范晔著的《后汉书》齐名，合称为二十四史“前四史”。《三国志》中记载的三国时代的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通过历代“说书”艺人及其广大的听众的加工渲染，添枝加叶，使许多故事不仅流传广泛，而且具有了许多传奇色彩。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些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再加工、再创造。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参见陶鲁笏：《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两部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把它当作一部书来读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晚年都读过多遍。这里，特向读者介绍一点笔者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建国以后，大约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离开北京中南海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之一。1958年11月到武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要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时，就带了《三国志》等一大批图书，会议期间，他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还写了两段长长的批注。这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据陶鲁笏同志在《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一文中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本人，一共4人，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门座谈陈寿撰著的《三国志》。35年之后，陶鲁笏回忆这次的座谈会时还很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都以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谈了他自己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和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看法。

说到毛泽东外出总要带上一大批图书的事，逢先知曾作过一次记录，这里，笔者把它照录如下：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

时我的登记本里照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8—20页)

从这份记录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博览群书的情形。记录中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毫无疑义，包括《三国志》。《三国志》是毛泽东很爱读的、也是批划最多的史书之一。

1958年9月，毛泽东离京去大江南北视察，曾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并三次去过延安的张治中应邀陪同前往。在此次视察途中，一天，毛泽东正在火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成了东吴的统帅。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人民政协报》1987年1月6日，余湛邦文。)关于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后罗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读了《吕蒙传》，他还请人将其译成白话文，供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以此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

据逢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这次，主席要读《三国志》，逢先知送给主席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读《三国志》，逢先知送给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全18册)。这部《三国志集解》，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有两处批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两处批语的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它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的很仔细，差不多都作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在读了卢弼的这段注后，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颇有感慨的批语：

这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据扫叶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弥”应为“祢”——笔者注)衡。”此为近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作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刘表在对待俘虏的做法上与曹操是大相径庭的。曹操所以能取得全局的胜利，这与他对俘虏的豁达大度是分不开的。曹操“不杀降”，敢于用人，史书有不少的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有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作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恇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

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这里，毛泽东又一次称赞曹操。

毛泽东晚年读《三国志集解》写了不少的批注，许多的篇章他都圈划得密密麻麻。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对《三国志》这部大作是极为喜爱的。

据笔者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楼名。该馆从清光绪末年即搜集南北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

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毛泽东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年 2 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 24 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毛泽东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75 年 8 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

李锐说：“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 25 页）“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国演义》就已经读得很熟了。对于这一点，1960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他 67 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的谈话中，在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还颇有感触地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他还很有兴趣地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演义》。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去说明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从哪些视角阅读《三国演义》的呢？

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也是时代的产物。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书中描写的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虽然经过作者对历代民间传说进行精心地综合溶裁和再创作，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反映了动乱的三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认为，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必然要影响到作品的主题。阅读、研究文学作品，不可不重视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各家更是各执一词。历史上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汉末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要其不表现皇权正统观念是很难做到的，作者罗贯中“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创作主题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古今一些文人学者的这种看法，毛泽东一方面是沿袭此说，一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

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又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参见陶鲁笏：《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

1959年，一次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毛泽东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50年代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前面说到的毛泽东曾批阅过的《三国志集解》，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中有关曹操的内容，毛泽东作了许多圈划，写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还有曹操所采取的政策。从这些圈划和批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我们从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鲁迅著作中还看到：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用红铅笔划上了粗粗的着重线，这一条条红线，把他与鲁迅连接到了一起。对曹操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是相通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曹操不仅是一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的战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给李敏、李讷的信中写到：“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李敏、孔令华主编《怀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曹操的诗作，毛泽东是很爱读的。在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我们常常翻阅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图书。我们这样做，一是为了了解掌握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具体情况，二是为了熟悉毛泽东平常爱读的书。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为毛泽东的服务工作。当然，翻阅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化有点什么了解的话，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的影

响和在工作实践中的实习是极其重要的。在翻阅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过程中，我们记得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还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些书上曹操的诗，毛泽东差不多都有批划。有不少的诗，如《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等，毛泽东阅读过多次，每次阅读他都要在这些诗上圈圈划划。读一次，圈划一次，多次阅读，多次圈划，时而用红毛笔，时而用红铅笔、黑铅笔或蓝铅笔，因此，有不少的诗，都圈划得密密麻麻。有一本《古诗源》，毛泽东用红铅笔在作者“武帝”两字旁划了两道粗线，“武帝”的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这段文字，毛泽东逐句圈点。《短歌行》这首诗的标题上，他还用红、蓝铅笔各划一圈。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文字旁，都划上了密密的圈记。曹操的诗，因为很爱读，也因为读得多，所以，有不少的诗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毛泽东都能熟练地背出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大概差不多都知道，在中南海散步时，或者漫步在海岸沙滩，或者在山间崎岖小道行进，或者在办公室里，毛泽东常常饶有兴致地吟诵古诗。曹操的一些诗作，就是他常吟诵的古诗词之一。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在海岸沙滩散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常这样低声吟诵。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在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央档案馆编辑，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就收入了两首，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墨宝，书法行家们都认为是当今我国书苑里的精品。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诗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胡乔木生病，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劝其“不计时日”养病，这封信中就引用了曹操的这两句诗，并对胡乔木说“此诗宜读”。从此，我们足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是很喜爱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曹操的诗呢？毛泽东生前在和他的子女们的一次谈话时这样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显然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相悖的。作者笔下的“汉贼”“奸雄”，毛泽东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作者罗贯中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小说中“扬刘抑曹”，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当时的现实社会方面的背景对作者有没有影响呢？毛泽东认为有，他还一路发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出，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不迷信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敢于冲破作者“扬刘抑曹”这一皇权正统思想的束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独到之处。

战争、外交、组织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三国鼎立时期，社会动荡，事态百变，势均力敌的魏蜀吴三国战争不断。《三国演义》记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各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兵书，也不是军事专著，但是，书中却有不少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千古流传的战争和战斗场面的描写，有有关战争战略、策略方面的记述，也有具体的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等许多的战役和战术方面的描写。例如：祭东风、赤壁大战、走麦城、空城计等等。所以，《三国演义》，毛泽东不仅把它当作三国时代的历史来读，通过它来知兴亡，鉴得失，明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而且还从战争的视角来读，从战略、战术的视角来读。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注重学习中可供借鉴的有关军事斗争的知识和思想材料。大概正因为如此，十年内战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和毛泽东领导所取得的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说毛泽东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这当然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别有用心地攻击，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熟读《三国演义》，注意学习《三国演义》中谈及的有关战争知识，并且取其精华，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这是无疑的。

说到毛泽东从战争的视角读《三国演义》可以追溯到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结合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谈及战略防御的原则时说过的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这里，毛泽东列举的我国历史上六个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三次大战，都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战例。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尤爱读《三国演义》中这些威武雄壮的战例。小说中描写的这些战例，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它们已经深深地存留在毛泽东的记忆中。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中这些著名的战例，不仅是因为作者对这些战例描写得生动、壮观，而且是因为这些战例中都包含有不少的战争知识。与其说毛泽东在读小说，倒不如说毛泽东在借鉴历史，研究分析和学习战争。

就拿吴魏赤壁之战来说吧。这是《三国演义》第47回着力描写的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大战。

曹操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之后，即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刘备和孙权的势力，席卷南方。刘备派诸葛亮去联合孙权，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他们一起抗击曹操。当时，曹操的军队号称80万，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大概也就是20多万人马，驻军乌林（现在湖北省洪湖县龙口乡，长江北岸）；孙刘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安营赤壁（现在湖北省蒲圻县赤壁乡，长江南岸）。双方隔江相望，在赤壁江面摆开了战场。

曹操的军队大半是北方人，不习惯船上作战，不适应江上风浪的颠簸。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曹操命令工匠把战船用铁索联在一起，又在船与船之间铺上木板，钉上铁钉，加以固定，以减少船身的摇晃，他们把这称为“连环船”。诸葛亮得知曹操采用“连环船”的战术之后，立即与东吴军队主帅周瑜等商议对策。周瑜部将黄盖提出用火攻的办法，烧毁曹操的“连环船”。

诸葛亮和周瑜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定了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事前安排了放火用的船只，黄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曹操，假意声称要带军队渡江投降。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11月的一个夜晚，赤壁江面恰好刮起了一阵比一阵紧的东南风。黄盖带领十只战船，船中装满了浇了油的柴草和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物，用黑色篷帐蒙起来，上面插上旗帜，向曹操的水寨驶去。战船的后面还拖着便于战斗的小艇。曹操深信黄盖来投降，所以毫无戒备。当黄盖的战船驶进曹操的“连环船”时，就立即放起火来。火借风力，风助火势，曹操的水寨顿时陷入火海之中，“连环船”被全部烧毁，连岸上的营地也都着了火。这时曹操明知中计，干急没法。周瑜和诸葛亮望见起火，立即擂动战鼓，指挥水陆两军全面进攻。曹军大败，孙刘联军夺取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

曹操败退后，一时无力南下，孙权巩固了在江南的统治，刘备占领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向益州发展。从此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孙刘获胜。它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之一。自古以来的战争，强者并非就一定能够战胜弱者，弱者并非就一定不能战胜强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少亦能战胜多，弱亦能战胜强，败亦能变为胜。少与多，弱与强，败与胜，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是战争中的辩证法。吴魏赤壁大战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说到毛泽东对赤壁大战故事的兴趣，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点有关的情况。在读书治学生活中，毛泽东生前有两个特别的喜爱。一是喜爱唐诗宋词，读得多，记得住，可以随口背诵。二是爱好书法，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在工作之余，饭后睡前，常常孜孜不倦地潜心练习书法，仅凭自己的记忆，书写了许多古今著名的诗词曲赋。书写的唐诗宋词尤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又练习书法，又学习唐诗宋词，这是“一举两得”。毛泽东工作之余书写的大量唐诗宋词墨迹中，我们看到过至少有两件是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赤壁战争有关的。一件书写的是唐人杜牧的诗《赤壁》，一共四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后两句就与赤壁大战有关。东风，就是指当时赤壁之战，周瑜用火攻之事。周郎，即周瑜。铜雀，台名，在北方的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这个台传说是曹操所建，上有楼，楼上有大铜雀高一丈五尺，因此得名，是曹操宴饮之地。二乔，指东吴有名的美女乔氏姐妹，大乔为孙策夫人，小乔是周瑜的妻子。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东风给了周瑜的方便，则很可能东吴要大败，连二乔也被曹操掳走锁进铜雀台了。另一件书写的是宋代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几句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里的大江，是指长江。风流人物，杰出的或英俊的人物，此指三国时代的包括周瑜在内的英雄豪杰们。“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军在这里击败了曹操，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作者苏轼所感怀的就是这些古人古事。毛泽东书写的这两件墨宝都被中央档案馆挑选编入《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赤壁之战早已成为历史，毛泽东书写的这两件与之有关的墨迹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战争场面是很有兴趣的。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对著名大战的描写。因为

他对这些大战的描写很感兴趣，所以他读得多，看得细，对作者罗贯中着力描写的这些大战的情形，他都很熟悉，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谈及。他从战争的视角读《三国演义》，从赤壁大战、官渡大战、彝陵大战等许多的战争、战役中学习战争的谋略，学习克敌制胜的策略，学习战争的知识，并密切结合实际，运用于他所领导和进行的革命战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一大特色。

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薄一波是山西定襄人——笔者注）——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毛泽东不但从战争的视角来读《三国演义》，而且还从外交、组织的视角来读《三国演义》，从读《三国演义》中联系到我们干部之间、领导班子之间的团结，联想到选拔和使用年轻干部。这些都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等历史古籍的重要特色。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很重视进行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是很为关注的。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读《三国演义》，笔者在这里先介绍毛泽东的一段历史佳话。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对国民党的情况作了极精辟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极高明的斗争策略。如何制裁反动派呢？这在《巨人之谜》一书中有生动的叙述：

“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

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这里，毛泽东慢慢地掏出火柴，点燃手里的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将烟喷出，烟雾飘渺，变化无穷。

在场的所有人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毛泽东又接着说：

“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为什么呢？”

在场的李卓然听得入了神。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

“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读过。”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为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扬振之等：《巨人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42页）

毛泽东的侃侃而谈和口若悬河般的宏论，特别是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便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上述毛泽东谈到的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着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の上策”。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书中谈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并能用它来说明现实问题。这不能

不说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联系实际问题，从作品中寻求启示的视角。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常常联系实际问题，从中寻求启示。他常常“以既定的思想水平和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17页）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1926年5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过：“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用“唯物史观”这个锄头，去挖掘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中国历史小说，从而独辟蹊径，探寻出新的思想，得出新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转引自《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31—132页）

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在文章、书信、谈话、讲话和报告中谈及《三国演义》，用《三国演义》中的话或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1936年9月8日，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句名言，来说明“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全国抗日运动推动下，在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予以拒绝，反而更加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在西安软禁了蒋介石，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当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无限期地监禁，有人主张公开审判，更有人主张把蒋介石杀掉。而中国共产党从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宽大处理，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了说服当时党内的同志，毛泽东就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说：“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战场上打死的；有站着死的，坐着死的，躺着死的……蒋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3页）1937年7月，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实践论》中，他又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动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的指示中，又一次引用《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说明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要妥善解决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关系。修理和服务行业过于集中，群众不满意，就需要适当地分散和多设一些点，以方便群众。

《三国演义》第 49 回有“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一句话。1958 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在推进和肯定这一组织形式的时候，毛泽东把它与历史上的一些农民对大同世界的探索和试验很有兴趣地联系起来。这从 195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读《三国志·张鲁传》（魏志卷九，裴松之注）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于 12 月 7 日和 10 日先后写了两大段批注，长达 1500 字左右。他还指示将他 10 日写的批注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印发与会者。毛泽东似乎从读《张鲁传》中隐约看到了“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渊源。所以，他高兴地写道：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

---

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以光明与黑暗为善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1120 年的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杨么：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名太，龙阳（今湖南汉寿）人。他继承钟相起义，有众二十万人。后为岳飞击败，牺牲。钟相：杨么前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有众数十万人。后被孔彦舟袭败，牺牲。明教：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战胜黑暗。组织多次农民起义。红军：也称“红巾”。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山童牺牲后，福通拥立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兵败后归朱元璋，病死。徐鸿儒：农民起义领袖，明山东钜野人。明天启二年（1622），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战败牺牲。唐赛儿：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山东薄台人。永乐十八年（1420）发动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白莲教：混合佛教明教等内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庆元年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义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鲁有林清、李文成的起义。

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间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对张鲁行“五斗米道”的一些具体作法，毛泽东很为赞赏，并把它与当时在我国大地上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对照。毛泽东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又写道：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我们知道，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前后整整读了二十四年，写下的批注也不少，但像这样长的两大段批注，笔者所见到的，这还是第一次。《张鲁传》全文不足300字，毛泽东写的这两段批注比《张鲁传》长好几倍。毛泽东对《张鲁传》的兴趣，实际上并不是始于这次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向与会同志推荐《张鲁传》也不是偶然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就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又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言谈话语表明，毛泽东对张鲁五斗米道几个月前就已有浓厚的兴趣。在毛泽东看来，历史虽已过去一千多年，现在与过去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张鲁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等，对人们认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很有启示的。借用历史来启发人们的认识，开阔人们的视野，让人们更大胆地进行创

造性地实践，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向人们推荐读《张鲁传》的主要意图。

用一千年前张鲁的五斗米道的实践来类比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和追求，当然是过于简单了。建立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实际，不能有效地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因而不成功，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纠正已经出现和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减少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 1959 年 4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之前，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当时全国各地盛行的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大家看看《三国演义》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作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不少干部认真阅读了郭嘉传，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等错误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26 日）

说到毛泽东爱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还有这样一件事：1970 年 3 月，毛泽东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为了说服中央委员能够同意他的建议，不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用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启发大家。毛泽东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龚坤祥著《毛泽东，信步危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9 页）

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总之，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是多视角的。上面说到的视角，只是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视角。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更爱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阐发他的认识。到了晚年，他老人家也还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现在也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在我国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流传，毛泽东读这两部书时写下的批注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读《西游记》，“要看到

## 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作者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孙悟空，也是作者吴承恩的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坚定不移，团结一致，坚持奋斗。那匹小白龙马，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的精神和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很爱读的又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西游记》是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神话小说。故事来源于唐代名僧玄奘西行到印度取经及从唐末到明代大约六百年民间传说、戏曲、平话，经过许多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和加工，最后由明代吴承恩再创作而成。它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的巨著。前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的故事。通过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描写，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秩序一定的反抗精神。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描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佛主，求得真经，成了“正果”。小说用幻想的形式塑造了孙悟空这一有智有谋，不畏强暴，勇于反抗，不怕困难，神通广大，敢于斗争的形象，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西游记》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的齐天大圣，几百年来深受男女老幼的喜爱。加上电影、电视和多种新闻媒介的宣传，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很爱读《西游记》。他的老同学萧三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据萧三的回亿，毛泽东还对他说过：“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936年，毛泽东自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曾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西游记》固然与《水浒》不同，它不是直接描写农民造反的专著。但是《西游记》着重描写的是主人翁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和一个个想象丰富、曲折生动、语言诙谐、独具风格的造反故事。所以，毛泽东对《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也是一直很喜爱的。直到晚年，他老人家对《西游记》还有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爱读《西游记》，更喜爱孙悟空这个敢于冲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神话人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书信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常常谈到孙悟空，有时候把他作为正面形象来宣扬，有时候又把他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每一次引用，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体现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故事，说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和诗词当中，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是很多的，但是，引用最多的或者说他最有兴趣的，大概就要数这个齐天大圣了。

早在 1938 年 5 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认为，“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3 页）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说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引用孙悟空的事，王炳南在《阳光普照雾山城》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45 年 10 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又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6 页）这里，毛泽东两次提到孙行者（即孙悟空）也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西游记》第 6 回中有一个故事，说孙悟空有 72 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还能变为各种各样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玉皇大帝的战将杨二郎相遇，孙悟空变成一物，杨二郎即变降他的一物，双方变来变去，最后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结果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有好几次在讲话当中说到这个故事。

1953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在谈到梁漱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11 页）

到了 60 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风采更是称赞不已，激情“欢呼”。1961 年 11 月 17 日，写下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

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铁译，《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

直到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些猴气。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前几年，还是以激情洋溢的诗句“欢呼孙大圣”，今日，他自己就变成了孙大圣“这样的大王了”。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很爱读《西游记》，许多读者对此大概早有所闻。那么，到了晚年，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他对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仍有浓厚的兴趣，还时常翻阅，时常与人侃侃而谈。对于这一点，读者所知所闻大概就很少了。

说到毛泽东晚年爱读《西游记》的事，这里，笔者把过去知道的事和当时所见所闻介绍给读者。

毛泽东晚年在南海住地的会客厅里，也就是他晚年的书房里，一直放着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这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是：

《西游记》世界书局版

上、下册

《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上海广益

书局1924年版1—16册

《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

光绪庚寅（1890年）校印1—20册

《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

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1—10册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

4月版上、中、下册

根据当时的记录，进入70年代之后，毛泽东先后有两次向我们要过《西游记》。一次是1971年8月初，他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来的，大字线装本，就是上面说到的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那种《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线装本，全20册，他的书库里也没有，我们是从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年）刊本，他翻阅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退给我们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因为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一直放在身边。第二次是1973年3月上旬，这一次他指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新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他跟前已经有了大字线装本的《西游记》，为什么又要新出版的平装本呢？

当时，在我们管理图书人员的头脑里也都有这个疑问。后来秘书徐业夫告诉我，他说线装本有个别地方字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首长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毛泽东看别的书也喜欢这样做，他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毛泽东的这种读书习惯，除了徐秘书说的这个意思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呢？我们就说不清楚了。据我们的记录，1973年4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向我们要《西游真诠》，同时还要《西游原旨》一书。《西游真诠》，我们是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原旨》，是从中国书店购买来的，是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1819年）刊本，全24册，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伴随着毛泽东度过终生的诸多的图书中，上述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这部《西游原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上列的毛泽东晚年会客厅里一直放着的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毛泽东晚年曾多次阅读过。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还写下了批语。它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仅存的毛泽东写有批语的《西游记》。这种版本的《西游记》，装帧倒不怎么讲究，字也不是很大，但字都印得很清楚，与小32开本差不多大，每册很轻，看起来很方便，所以，毛泽东也很爱看。毛泽东在这部书上写的批语，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有这样两段：

一段是在读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时写下的。作者在这一回中，写高老招猪八戒做女婿之后，在与唐僧一行谈及他这个女婿时说：“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三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唐僧听后说：“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就是在读到这里时写下的。是出于对猪八戒的同情呢？还是对唐僧的话感到意犹未尽，因此读了以后就随着思维蒙发的火花一路有感有发呢？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说得清楚。笔者认为，应当是前者。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是这样写的：

只因为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上述的高老在唐僧师徒面前嫌其女婿吃得多，唐僧为徒弟八戒说情，说“他做得多，所以吃得多”。这本来是小说中很为普通的一段描写，然而，它却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维，信手写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批语。这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

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虽是1891年出版的，但毛泽东阅读批注此书，大体时间应是在50年代后期。根据有三：一是50年代初期，毛泽东进城之后，从延安带过来的图书不多，特别是线装本的图书就更少。随着毛泽东的读书需要，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后来田家英、陈秉忱、逢先知等陆续为他购买配置了一部分线装古籍图书。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购买配置的。二是本书印的字似3号宋体字，小32开本，这样小字号、小开本的线装书，60年代之后，他一般是很少看的。三是从批注的字迹和用笔来看，批注是用黑铅笔写的，因为本书天头空的地方不大，所以批注的字写得也不大，字迹是流畅自如的行书体。我们知道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

读书写的批注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写的行书字体。如读鲁迅著作单行本写的批注，读二十四史写的批注等等，用的都是铅笔，写的都是行书字体。由此判断，这一段批注像似 50 年代后期所写。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段批语可能是在 50 年代后期写的。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中，他明确主张“多劳应当多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 50 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城乡各地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这一符合实际，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 50 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一时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在人民公社内部不实行按劳分配，而搞平均分配，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为此，195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昌召开了会议，开始着手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同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倾向。1959 年 2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严肃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实行平均分配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由于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才使这种“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得以纠正。直到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上，毛泽东又一次写道：“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里，毛泽东把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提到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的高度要人们加以重视。正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主张实行平均分配，不要按劳分配；也正因为这种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张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实际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果断地批评和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倾向。这是毛泽东写下这段批语的直接的思想缘由。毛泽东写的这段批语，与他在 50 年代后期的思想实际是紧密关联的。批语是毛泽东当时思想实际的一种表露，也是他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一种再思考再认识。联系社会 and 思想实际问题读书，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直到晚年，他一直坚持着这样做。这段不长的批语，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在读“闲书”的时候，头脑里似乎也没有停止对诸多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思考。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读“闲书”，就如同欣赏名人书画一样，其主要目的在于休息和调节大脑。然而，在实际的读书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就拿笔者在这里提到的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来说，他在读这部“闲书”的过程中，头脑里似乎还在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坚持和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实际，所以当他读到唐僧说的“只因为他做得，所以吃得”的话时，就如同心中的一直难以平静的波澜，又遇突起的飓风而更加汹涌澎湃起来一样，因此，情不自禁地挥笔疾书了上述的那一段批语，再一次借机强调“多劳应当多得”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原著中，与这段批注相关的还有这样两段话，猪八戒对假妻子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耘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第 18 回）孙悟空对高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然食肠大，吃

了你家些茶饭，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样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把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第19回）这两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还都用铅笔一一划上了道道。

第二段批语，是在读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的。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术把千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用黑铅笔都划上了道道。毛泽东的批语，就是在读这段话时写的。毛泽东写道：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唐僧的善恶观，孙悟空不信，作者吴承恩不信，毛泽东也不信。毛泽东认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乡愿”源于《论语》，是孔夫子的话。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可见孔夫子对“乡愿”思想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乡愿思想呢？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就是《西游记》中所着力描写的唐僧的待人处世哲学。唐僧的善恶观，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这种“乡愿”思想，不仅不能号召和鼓舞、团结人们去斗争，去除恶，去积善，而且还容易长“妖魔鬼怪”的志气，灭革命造反派的威风，鼓励、放纵“魑魅魍魉”作恶成灾。唐僧就是因为笃信、主张、恪守这种思想，所以三番五次地遭受苦难，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毛泽东对唐僧虔诚信奉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极为反对的。孙悟空的思想行为正与此相反，战妖魔，斗鬼怪，尽管一次次遭受唐僧“紧箍咒”的约束和折磨，然而他不改初衷，始终勇敢战斗，全力除恶求善，为师徒四人朝接日出，暮送晚霞，排除险难，不断向西天行进，直到最后面见佛主，求得真经立下汗马功劳。没有孙悟空一路上的战妖除恶，斩魔行善，师徒四人要到达西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孙悟空的思想与唐僧“乡愿”思想是相反的，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所以一次又一次称赞孙悟空，“欢呼孙大圣”，大概这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善和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善就有恶，善恶并存是永恒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这样的话，后来还说过多次。1956年9月27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这就是毛泽东的善恶观。

对于有善就有恶即善恶并存的思想，《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西游记》是写佛门之事，对开口就是“善哉！善哉！”的和尚的描写，照理说对他们的慈悲和行善应当多用点笔墨，然而吴承恩笔下的所谓四大皆空的和

尚仍然是贪财好色的：观音禅院的老和尚为了谋夺唐僧的袈裟不惜放火焚烧寺院，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宝林寺和尚仍然是用世俗的势利眼光看人，欺软怕硬，却无半点慈悲心肠。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被佛教宣传为天堂般的西方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世界里，还有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伽叶需索取经的人事（索贿赂），和我们现在社会中的贪污行贿的事一样。孙悟空将此事告到佛主如来处，如来反说：“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唐僧无物奉承，只得将紫金钵盂奉上。书中对阿傩接到取经的人事后的丑态是这样描写的：“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差！不差！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第98回）可见成了佛的尚也是非常爱钱的。唐僧取的无字经被白雄尊者抢去后，满眼垂泪地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毛泽东对《西游记》中这一段的描写看得很细。对阿傩丑态描写，都划上了道道或浪线，在“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这句话后连划了三个圈圈。对唐僧说的“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这两句话下面分别划上两条粗粗的横道，末尾还划上了两个大圈。从划一条横道或一条浪线，到划两条横道或两条浪线；从划一个圈、两个圈，到划三个圈，这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留下的标志。这种种的标志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的思维或思想活动的轨迹，是对原书内容的一种反映。它表明毛泽东晚年在阅读《西游书》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它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对《西游记》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读起来依然是很有味道，很有兴趣的。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西游记》，固然没有《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等那么多的版本，但它也一直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最后最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一生中，阅读和批注过的图书是很多的，但毛泽东阅批过的《西游记》，保存下来的只有上面我们提到的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它是毛泽东晚年阅读《西游记》的重要记录，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一份重要史料。

毛泽东晚年不仅爱读《西游记》，而且对《西游记》的研究也非常关心。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报刊先后公开发表了一些《西游记》研究文章。1957年，作家出版社将几年来国内报刊上先后发表的《西游记》研究的重要文章汇集编辑出版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一书。对《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毛泽东也是一一精心研读，孜孜探求。

说到毛泽东晚年关心《西游记》的研究，爱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笔者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的情况。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4月编辑出版）也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仅存一部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西游记》研究专著。这部论文集，共收研究论文17篇，附录1篇。它虽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论文的全部，但它是《西游记》研究论文之荟萃。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在本书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所收的只是截至发稿以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散篇论文。未曾发表的文稿、整本和专著，已经被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或其他选辑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

这本《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约13.5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在阅读的时候还写下了批注，划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

卷首篇是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翻开这本论文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在张天翼文章篇首写下的“1954年，2月，人民文学”一行非常醒目的批注。开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看完张文的尾注我们才明白，毛泽东的批注意思是说张天翼的这篇论文原载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标题的左边，毛泽东用黑铅笔连划了三个大圈，格外引人注目。“张天翼”三字下面还划两条横道。全文从头到尾几乎逐段逐句都划上了横道、浪线和圈圈。圈划的种种符号表明，张天翼的这篇文章，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阅读的，看得很细，而且是十分用心的。张文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对张天翼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似乎很有兴趣，在阅读的时候又圈又划。在谈到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评价时，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以前，还没有见过哪一家写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写得像这么生动，这么艳异多彩，而又这么亲切，这么吸引我们的。”毛泽东似乎对这段话有同感，或者似乎对这段话比较欣赏，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每句话下面，他都用黑铅笔划了两条横道。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读这段话时是引起一定的思维活动的，是颇有感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现实性和幻想、寓意等等”。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圈划的符号比第一部分还多，还密。在这一部分中，对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看法，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划上了一条横道。最后的一句“力量不敌而已”划了两条横道。段末还划一个大圈。对这样的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都看得这样细，看得这样用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西游记》的浓厚兴趣和对《西游记》学术研究是多么地关注和重视。

张天翼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个附注，共三条约2000字，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1957年，毛泽东已经64岁，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6号字看起来显然是很吃力了，然而，毛泽东如同读正文一样，也还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划上了道道、圈圈。字排得小了，圈划的种种符号就更显得突出了。圈圈划划，密密麻麻，满页皆是道道和圈圈。附注的第二条，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两段：“《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为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她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这两段文字，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一一划上了道道或浪线。第二段的末三句，每句下面除划了浪线

外，每句末尾还都划了一个圈。附注是与正文有关内容密切相联的，它是对正文有关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或注释。看了正文，再看附注（有的叫注释），或者把正文和附注联系在一起来看，这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读别的书如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时就是这样。注释的字一般都小于正文的字，对毛泽东来说，看注释当然比看正文吃力。然而，他有时读注释比读正文还仔细，还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等受文章整体结构、主题内容和语言文字表述方式方法的限制，所以往往是一笔带过。要使读者知其所以然，作者往往用加注的形式，把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补充交待清楚。就如同上述的张天翼在正文第一部分内容中，只写“例如观世音菩萨”几个字，要知道观世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受许多人的欢迎，只有阅读他的附注才能有所了解。毛泽东所以爱读注释的文字，大概这就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童思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篇首开头处，毛泽东也写了一行批注：“1956年2月，西南文艺”。“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还划了一条浪线。他的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原载1956年2月2号《西南文艺》杂志。文后的注“（原载‘西南文艺’一九五六年二月号）”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毛泽东也划了一条浪线，“一九五六年”几个字下面划两条横道，“二月号”三个字下面划一条横道。文前的批注与文尾划的浪线和道道，意思是一样的。标题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用铅笔划了三个大圈。作者“童思高”名字下划了粗粗的两条横道。非常醒目的三个大圈和两条横道，大概是表明毛泽东一定的心理意向。这部《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收入的17篇论文，毛泽东在篇前写批注和在题目上划三个大圈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前面说到的张天翼的文章，第二章就是童思高的第一篇。毛泽东在这里划的三个大圈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17篇中只有两篇题目划了三个大圈，而这两篇毛泽东看得最仔细，圈划的各种符号又最多。这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重视，也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喜爱和浓厚的兴趣。对这两篇论文，毛泽东在阅读中虽然没有写下什么评价和称道的话，但是阅读圈划的具体情形可以反映出这两篇论文在这部论文集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也反映出毛泽东称道这两篇论文的一种心理活动。阅读圈划的实际表明，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篇论文，很爱读这两篇论文。毛泽东阅读这两篇论文思想上闪动的火花或受到的启示、甚至产生的某种共鸣，都渗透或凝聚在他本人圈划的各种符号当中。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划的种种符号，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知道它所表明的明确涵义，但它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划下的，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思维活动的轨迹，是毛泽东读书实践的记录和反映。它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实践一定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毛泽东阅读童思高这篇论文圈划的具体情形吧。

文章一开头，有毛泽东写的“十六世纪”四个字，这是毛泽东对本文第一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约公元一五一年——一五八一年）”的批注。接着本文作者写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毛泽东划了两条横道，句末还连划了两个圈。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古典小说，不仅当作小说看，而且当作历史看。他是很注意作品和作者的社会背景的。这里的圈划，至少也表明了这一点。

童思高的这篇论文共分六个部分，毛泽东圈划最多的是第一、二、五、

六这四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引了原著第35回中孙悟空和李老君的一段对话：

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铃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天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逃老孙，教保唐僧西天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措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吧。”

这段对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其中“该他一世无夫”一句，除了划横道外，句末还连划了三个圈。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者引了孙悟空说的一句话：“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毛泽东读后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接着作者又引了唐僧说的一段话：“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面恶心善’，何以惧为？”毛泽东在阅读中，前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一条横道，后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末尾还连划了三个圈。孙悟空和唐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毛泽东读后又划又圈，表明他对这些话的赞同的心理取向。

童思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在论述神魔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统治阶级的作贱人民和妖怪的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民的大害。”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因此格外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大概是作者的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吧，所以，毛泽东读了这句之后，在“作贱人民”“妖怪的害人”九个字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后两句下面都划了浪线，句末连划了三个大圈，因为不是段末，所以划的三个大圈把后面一句话的前两个字都划进圈里了。可见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是不寻常的。

这篇文章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在谈到“神佛既是要唐僧西天取经，为甚么又要使妖魔为难，增加取经的困难呢？”作者在这里引《西游记》第77回孙悟空说的一段话：“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毛泽东对孙悟空这段话很感兴趣，阅读中差不多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两条横道，第一句、第二句后面都划了一个大圈，最后一句末尾划了三个大圈。如此又划又圈，在毛泽东读过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是仅此一处。圈划的几种符号非常突出，特别引人注目。这段话是孙悟空在去西天途中遇到严重困难时说的一段生气的话，也是一段牢骚话。它是孙悟空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逆向思维的反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孙悟空的这种逆向思维，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毛泽东似乎觉得它是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能从不同的思路去思考，去提出问题，不拘泥，不守旧，这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和提倡的思维方法。大概是心里赞同或者是称道孙悟空的这种思维方法吧，所以，他在阅读中才如此圈划。不过，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若果如孙悟空这样说，也就没有取经故事了，也就不会有《西游记》这部小说。”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不理解的。

除了张天翼、童思高两篇论文外，《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萧歌、

竞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这篇文章，毛泽东在阅读中也有许多的圈划。本文作者在谈到吴承恩与《西游记》创作的社会背景时写道：“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何况他又是个失意者呢！他在科举上很不得意。虽然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并不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毛泽东在读这段话时，除划横道外，在“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这句话旁边还划了一个问号，它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划的唯一的的一个问号。这里作者引用的对吴承恩评价的一段话，出自《天启淮安府志》。这样评价吴承恩，是否与实际相符？大概毛泽东对此有点疑问，所以阅读时就划了一个问号。在谈到吴承恩创作时的思想感情时，作者还引了吴承恩的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延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首诗揭露了豺狼当道的黑暗局面，表现了作者胸中的愤慨，毛泽东很爱读，每一句下面都划了浪线。接着，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吴承恩，本文作者又引了吴承恩的一首《满江红》词：“穷眼摩挲，知见过，几多兴灭，红尘内，翻翻夏夏，孰为豪杰？傀儡排场才一出，要知关目须听彻，纵饶君局面十分赢，须防劫！”词中，吴承恩对统治阶级的骄傲、虚伪、昏庸、愚昧，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这首词的后半阙，作者嘲笑那些贪图高官厚禄、封子荫妻的士大夫们。吴承恩写道：“身渐重，头颅别，手可炙，门庭热。施安排娇面孔，冷如冰铁，尽着机关连夜使，一锹一个黄金穴，被天公赚得鬼般忙，头先雪。”吴承恩的这首《满江红》，毛泽东很喜爱，句句划上了浪线，每一句后面还划一个圈。看得出，这首词，他读得是非常认真的。在《西游记》研究的论文中引用的吴承恩的诗词，毛泽东都如此爱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特殊的兴趣。

萧歌、竞华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篇附记，是这两位作者给编辑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作者对上述文章中谈到的一些体会的补充和说明，也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字虽小，毛泽东也都一一阅读和圈划了。

这部论文集中，还有沈玉成、李厚基的《读〈“西游记”札记〉》，沈仁唐的《西游记试论》，李大春的《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等等，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有许多圈划，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所以，到了耄耋多病的晚年，他老人家还常常黄卷青灯，爱不释手。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爱从哪些视角去阅读《西游记》的呢？这大概是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这里笔者将自己所闻所见和在实际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读者。

政治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视角。

《西游记》是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是怎样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呢？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有关的几次谈话。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同文

艺界的同志有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旨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对当时在座的文艺界的同志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闹天宫，反官僚主义。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神话故事与反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阅读《西游记》与国内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没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他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就紧密联系起来。

6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很严峻的。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下的光辉诗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严峻形势的最好的写照。1963年7月，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攻击的回击形象地比喻为“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同苏共中央的斗争中，毛泽东本人就像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高高举起千钧棒，奋力澄清万里埃。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坚定地号召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率领全党同志“大闹”苏共中央这个“天宫”的同时，对国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也极为关注。1964年9月7日，在故乡湖南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号召人们：要斗争。他说：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毛泽东这里说的批评的对象显然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激情欢呼的“孙大圣”也不是泛泛而谈的革命者的代名词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向人们反复强调：“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

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直接与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站在孙悟空一边，保护孙悟空，为孙悟空欢呼，向孙悟空学习，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政治斗争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独到之处。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所以能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生前曾与一些领导干部和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西游记》时都说过：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毛泽东还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团结奋斗，毛泽东对此是极为关注的。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早在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中央委员群众说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1948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的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中又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河中，毛泽东一贯是非常重视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在读《西游记》这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时，他也非常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视角去寻求启示。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独到之处。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视角读《西游记》，并从中寻求启示。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毛泽东将孙悟空比喻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西游记》第7回谈到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虽然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斗争是必然会胜利的。同时还谈到了“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的具体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这里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时，毛泽东指出：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毛泽东说：“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为了说明这个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这里还讲了唐代大作家柳宗元写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页）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用《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孙行者就是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把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比作孙行者，把我们自己比作铁扇公主。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时，又一次谈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武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革命斗争和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在实际工作中，在谈到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时，毛泽东常常是这样不拘一格地与《西游记》相联系，从具体的神话故事中寻求启示。许多的政策和斗争的策略，通过毛泽东的口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故事来加以阐明，说来引人入胜，道来妙趣横生。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说到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段小故事。

1961年国庆节前夕，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根据《西游记》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精彩表演，使毛泽东对这出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出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始终很有兴致地观看。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当演到“天王庙”一场戏时，看到孙悟空被贬，唐僧被白骨精擒住，猪八戒逃走时的蹉步、蹒步、跑跳等夸张动作，毛泽东则捧腹大笑。这出戏先后在北京演出多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曾三次观看演出。看了演出之后，他特意写了一首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诗是这样的：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老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唐僧的憎恨，提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看到郭老师的诗后，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认为郭老对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也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和诗后，认为毛泽东的诗，气势宏伟，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看问题。他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他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当天又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  
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  
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  
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  
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老的这首和诗后，于 1 月 12 日，非常高兴地挥笔在郭老这首诗旁边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刚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浙江省绍剧团的主要演员也挨了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绍剧团著名演员的“解放”工作很关心。1971 年 9 月 3 日，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第二天，他就向有关方面询问了扮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那个美猴王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风趣地问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压在五行山下？9 月 5 日下午，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后来，绍剧团的著名演员都很快“解放”了。

这里，毛泽东把“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对著名演员的“解放”政策，和《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联系起来，话说得不多，但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字字句句都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作者和作品的创作主题的视角。读《西游记》与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一样，毛泽东对作者和作品创作的主题是很为关注的。作者和其创作的小说作品，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其创作作品的主题是密切相联的。作品创作的主题总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总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实际相联系的。历史演义小说是这样，像《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读《西游记》，不仅在读一个个神话故事，而且还从作者和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把它当作形象的历史材料来学，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特点。

本文上面提到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不少文章都谈到吴承恩和他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都一一圈划。萧歌、竞华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吴承恩生于公元一五〇一年，卒于一五八二年。这一段时间内，明朝的皇帝换了五个（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从当时的阶级斗争来看，武宗正德年间是明朝农民暴动范围最广、斗争最强烈的时期。……除去农民暴动之外，还有许多次城市居民的暴动。……从封建王朝的内部来看，帝王荒淫无道，委政权奸，朋党对立，互相倾轧。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奸臣、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例如：正德年间的刘瑾；嘉靖年间的严嵩、严世蕃。直言极谏，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官吏，先后被奸宦的特务、钢刀、监狱和酷刑夺去了生命。能够在朝做官的，多半是权奸的奴才，不然就是噤若寒蝉，混吃等死的傀儡。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这些文字，毛泽东在阅读中差不多都划上了横道道。

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沈仁康《〈西游记〉试论》一文中，论述得更为详尽，从政治说到经济，从农业说到商业，对朱明王朝的专制独

裁、奢侈腐朽、荒淫无耻、昏聩平庸、残害人民、疯狂掠夺、无恶不作等都作了分析。最后，作者指出：“总之，农民、市民与进入垂死阶段的封建势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西游记》产生的时代特征。”这篇文章，虽然作者已经在文后说明有“不少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从头至尾，又读又划，圈划符号密密麻麻。一条条横道、一条条浪线、一个个圈圈，如同一道道耀眼的光环，折射出毛泽东把《西游记》当作历史材料来评读的心理。与其说毛泽东在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不如说毛泽东在读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毛泽东把小说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把小说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的一个佐证。

关于《西游记》创作的主题思想，鲁迅、胡适等都曾有评述。鲁迅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5—136页）胡适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易竹贤辑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到底应当怎样理解这部大作的主题思想，上面说到的毛泽东阅读圈划过的张天翼、童思高、萧歌和竞华等《西游记》研究论文中都有评述。毛泽东在阅读这些评述的时候似乎分外用心，并有自己的倾向。

上面说到的文章中，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是怎样阐述的呢？毛泽东是怎样阅读圈划的呢？这里，我们将所知道的情况向读者作一些介绍。

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张天翼写道：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这取经故事里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于要造反。天兵天将们要去收伏，魔头们要反抗，就恶斗起来了。”张天翼因此认为：“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前）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反映出来的。而且，这故事愈经演变，愈发展，这一点就给反映得愈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在那原来的卫护封建正统的故事主题和题材里，却多多少少表现了人民的反正统情绪。”对孙悟空大闹天宫，张文写道：“究竟要闹出怎样一个局面来，起先连孙悟空自己都模里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这才忽然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因此，张天翼认为：“假如孙悟空闹成了功，那也不过是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着农民起义运动的高潮而爬上了龙位一样——自己成了地主头儿和统治者，而农民又照样被那换了姓的主子剥削着压迫着，终至于又闹造反。”

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张天翼在《西游记札记》中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是相合的。所以，毛泽东在阅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对张天翼上述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很有兴趣，读后在每一句话下面都划了横道道，有的话下面还划了两条横道，有的地方还划上了圈圈，足以表明他对这些分析的重视。

这里要说明的是，张天翼这篇文章，起初是发表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当时，毛泽东有没有及时看到和阅读这篇文章，笔者这里也说不

清。但笔者知道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这一期《人民文学》(包括张文),毛泽东没有阅读圈划的标志。这篇文章后被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毛泽东阅读圈划的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笔者看到的就是收入这部文集的这篇。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童思高的文章,是专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开头的几句话,好像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作者是这样写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作者以愤世嫉俗的情绪,讽刺揶揄当时世态;以神话式的幻想和虚构,创造了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名著。”这段话,毛泽东读后重重划上了横道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划了两条粗道道,句末还划了两个圈。

对神佛和妖魔的关系,童文的见解颇有新意。作者认为《西游记》中的神佛和妖魔一体,同属统治阶级。“神佛只不过是公开的‘合法’的压迫人民、掌握着人民的命运的统治者,有天兵天将、诸神法力等统治阶级的威权。使人民把他们奉为不可侵犯的神圣,并还要随时顶礼朝拜,供奉香火。稍有冒渎不恭之处,立即降祸生灾,万民受难。……妖魔是神佛的下属,是直接受神佛支配的压迫与统治人民的工具。”“孙悟空等要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而神佛则遣使妖魔安排了‘八十一’难,试他师徒果有真心取经。孙悟空战胜了一切妖魔鬼怪,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达成目的,成为‘正果’。这和当时人民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的痛苦心情是一致的。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压榨下,仍然发挥了无限的战斗性与创造力,具有丰富巨大的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力量。”“这个取经故事就构成了:一边是神魔——主宰世界的统治者,……一边是唐僧等众,虔诚修行,立志前往西天取经,克服了神魔安排的各种困难。唐僧等对困难的斗争,就变成了善与恶的矛盾和斗争。”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西游记》“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力。”

童思高的这一关于“神佛和妖魔同属统治阶级”和对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的评价,大概更能说明《西游记》的主题意义,它与毛泽东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句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所以童文中上述的有关《西游记》主题思想的一些评述,毛泽东读来尤有兴趣,并且一一圈划,有不少地方,都划了两条粗粗的横道,还有不少句末和段末,都划了三个大圈。这些圈圈划划,充分表明他非常重视这些分析。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与对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喜爱是分不开的,也是与童思高上面所阐述的他本人的思想观点相通的这一主题思想是分不开的。

把神话世界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神话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时,来宾们颇有感慨。毛泽东接着提出一系列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他又一路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想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5页）毛泽东的这一充满想象力而又风趣含蓄的谈话，把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沟通，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神仙和上帝，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孙悟空同玉皇大帝等天神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的失败和失败后的归顺，从一定的意义上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体现了人民渴望自由，征服自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毛泽东这样联系《西游记》，不拘一格去联想，去进行思维发散，这不能不说是他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者和作品创作主题的视角，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把小说当作历史读的一贯的做法。

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来印证或阐发自己的认识，说明一些实际问题。这也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视角。《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历史神话小说，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联系实际，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来印证或阐发他自己的认识。许多实际问题，包括人们工作、思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毛泽东这样去联系，去阐发，去加以说明，就能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就能使人心明眼亮，就能给人增加信心和力量，就能给人带来希望，就能给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一次在给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二大队学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学员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应当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要求时，毛泽东就借用《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侃侃而谈。他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地提到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毛泽东的通俗、风趣的讲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笑声，给学员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牛克伦：《熔炉》，《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干部要定期“放火烧身”，要经受锻炼的问题时，就引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进八卦炉里用火烧的这个故事。他说：“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孙悟空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2页）这故事见《西游记》第7回。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冷不防被太上老君的“金钢琢”打中，被众天兵抓住，玉帝命押到“斩妖台”将他剁碎。不料孙悟空法术高强，刀砍不动，枪刺不进，用火烧用雷轰也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就把孙悟空放进他炼仙丹的八卦炉里，用猛火烧七七四十九天。可是孙悟空在八卦炉里，不但没有被烧成“灰烬”，反而经过烟熏火燎锻炼出一双“火眼金睛”，变得更加刚强了。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还要锻炼，我们的每个干部当然人人也要锻炼。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在报告、讲话和与人交谈中，很爱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说的人随口引用，贴切自然，恰到好处，听的人入

耳入脑，受益非浅，回味无穷。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爱读《西游记》，而且读得很熟。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会读书，善于运用，就是像《西游记》这样的历史神话小说，他也把它与当今实际相联系，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启示。

在半个多世纪岁月中，毛泽东对《西游记》一直充满着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那是因为受书中的一个神话故事的吸引。那么后来，特别是踏上革命道路之后，直至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之后，为什么对《西游记》还一读再读呢？对于这一点，很多的读者一定都是很了解的。笔者认为，《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话小说，但是，《西游记》中有政治，有斗争政策和策略，有封建社会的掠影，有我们现实生活可供借鉴，为我所用的人物故事等各种历史资料，所以，毛泽东对它一直很喜爱。毛泽东阅读《西游记》，不是仅仅在读神话故事，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同一历史时期，他读《西游记》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视角。我上面说到的四个方面的视角，只是笔者的个人之见和个人的归纳，实际上远远不止这四个视角。还有文学的视角、语言运用的视角、人物塑造的视角，等等。因为他读《西游记》，有多种不同的视角，把小说当作政治书读，当作政策和策略的书读，当作认识和了解封建社会历史书读，当作处理和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参考书读。所以几十年里，他对《西游记》一直很喜爱。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西游记》，有平装小字本的，也有线装大字本的，现在大多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神话小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百花园里也是一朵艳丽夺目的奇葩。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游记》和其中的人物故事仍然会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社会和人民中流传。那么，毛泽东阅读和批注过的多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他关于阅读《西游记》的轶闻趣事，也一定会备受今人和后人的重视，在社会和人民中千古传诵。

###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 清朝的史料看”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自由恋爱。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作者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聊斋志异》中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如果说，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神魔小说，毛泽东最爱读的是《西游记》，那么，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狐传奇小说，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了。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是我国清朝初年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蒲松龄所撰。据说，我国现存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青柯亭本，分为16卷，共400余篇。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方面还发现并影印出版了作者的半部手稿定稿本，还有会校会注会评本，所收篇目比较完备。本书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书中的故事大都是以民间流传

的故事为基础，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境界瑰丽，艺术独特。作者通过民间广泛流传的、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个故事，通过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艺术创造，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深受人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形象。本书的作者以谈狐说鬼的故事形式，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和统治阶层及官吏们的腐朽生活与种种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种种封建礼教等多有揭露和批判。作者还以火一样的激情和无限同情的笔调描绘了许多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执著地追求人生自由和个性解放、热烈地向往美好生活的妇女形象。无论从作者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特色，还是从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社会现实价值，《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与《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古典小说一样，是一直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部古典小说。

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爱读《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关于他少年私塾读书的情况，他的塾师毛宇居曾回忆说：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1960年4月《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转引自高菊村等著的《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毛泽东本人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这里，老师和学生的回忆中虽然都没有直接说出读《聊斋志异》这部书，但两个人的回忆中都用了同一个“等”字，这“等”字中是不是包括《聊斋志异》呢？如果说这里的回忆还没有直接说出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聊斋志异》，那么，下面的回忆说得就很明白了。李锐在其记述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著作中，谈到毛泽东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时写道：“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4页）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毛泽东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读我国一些著名的古典小说，《聊斋志异》是我国非常著名而且流传很广的古典小说之一，所以，《聊斋志异》引起少年毛泽东的阅读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在谈到矛盾的互相转化的问题时就说到了《聊斋志异》。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是互相变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331页）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说到《聊斋志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聊斋志异》如同《西游记》、《淮南子》、《山海经》一样，毛泽东都是读得很熟的，这些书中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他都一直记得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毛泽东还多次阅读《聊斋志异》。说到毛泽东晚年读《聊斋志异》的事，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一下笔者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会客厅里，放有许多毛泽东晚年常看的图书，其中就有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有线装大字本的，也有平装小字本的。笔者知道至少有以下4种不同的版本：

《详注聊斋志异图咏》	上海同文书局印行	1—8册
《聊斋志异》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95年9月版	1—4册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2月版	1—12册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6月版	上、中、下册

1974年2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有两部，一部是放在会客厅里，另一部是放在办公桌旁的书架上。这四种《聊斋志异》，毛泽东晚年都翻看过，有的看过多遍，有的还作了圈划，有的还写有批注。圈划和批注的具体情形，笔者下面再详细介绍。

除这四种外，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毛泽东书库里还存放了以下十种线装本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评注图咏》	1—16册	
《聊斋志异新评》	1—13册	
《详注聊斋志异图咏》	光绪十二年（1886年）版	1—8册
《聊斋志异》（影印本）		1—4册
《聊斋志异新评》	1—13册	
《聊斋志异》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年5月版	1—5册
《聊斋志异》	1—8册	
《聊斋志异新评》	康熙己未年（1679年）版	1—16册
《聊斋志异》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年9月版	1—4册
《聊斋志异》	咸丰乙卯年（1855年）版	1—16册

还有4种平装本的蒲松龄的著作：

《聊斋故事选》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年3月版	1册
《聊斋故事选评》	中华书局 1962年8月版	1—3册
《聊斋白话韵文》	朴社 1929年3月版	1册
《聊斋志异拾遗》		1册

这些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著作，差不多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管理图书工作的人员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和对中国古籍阅读广泛的需要，陆续从旧书店、旧书摊上购买来的。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种版本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毛泽东不是古籍版本的收藏家，对各种古籍版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毛泽东非常嗜爱中国古书，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等，他尤为喜爱。所以，管理图书工作的人员在旧书店里、旧书摊上，一见到毛泽东喜爱的图书就把它购买回来放到他的书房里。每当毛泽东走进他的书房，看到新购买来的图书，总要先粗略地翻一翻，先知道个大概，然后才看其他的书。第二，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

浒》、《西游记》一样，常常将几种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或者翻翻这一种，或者看看那一种，这些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据笔者了解，不能说是全部，恐怕绝大多数，毛泽东都阅读过。有的不知道反复看过多少遍。笔者听陈秉忱说过，上海同文局印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9 月出版的《聊斋志异》，大概是 1955 年秋季购买的，那时候，毛泽东还在丰泽园居住。陈说，这两种书买回之后就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西厢房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一见到就很喜爱。1966 年 8 月毛泽东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居住后，这两种书随着他诸多的他晚年爱看的古籍（包括 1952 年置的那部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和各种字贴、墨迹等）一起搬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毛泽东逝世之后，遵照中央有关负责人的指示，1979 年初陈秉忱领着我们几个人在游泳池整理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图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两种，陈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两种书是我替主席买的。”陈说，那时候，他和田家英、逢先知等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晚饭后、星期天等闲暇时间，他们几个人常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东安市场等处为主席购买图书。说到这里，陈突然停了下来，想了片刻后又接着说，大概是一天晚上，田家英找到了他，说主席要看《聊斋》。第二天他就去中国书店买了这两种。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一页一页翻看起来，似乎仍然沉浸在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从 1955 年到 1976 年，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21 年来，毛泽东把这两种《聊斋志异》一直放在自己的身边，可见他对蒲松龄的这部著作是多么地喜爱了。这两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许多地方用黑铅笔作了圈划。后一种《聊斋志异》，毛泽东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这两种《聊斋志异》都是毛泽东生前很爱读的，连同上面提到的各种《聊斋志异》，现在它们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瞻仰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们都会看到，故居里到处都放着书，在那浩如烟海的图书典籍中就有笔者上面说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

毛泽东在《聊斋志异》上写的批注，很多读者一定是很有兴趣的。这里笔者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批注向读者作一简略的介绍。

《聊斋志异》卷六中有一篇题目叫《小谢》的，这一篇是写渭南一个穷书生陶望三借住在一座鬼魅感人的旧府第内，被乔秋容和阮小谢两个女鬼恫吓、纠缠、调逗，但他却不惧、不恼、不动，且对两鬼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二鬼被感动，就拜他为“师”习字读书。几个月后，小谢“书端好”，秋容“能诗酬唱”，且因受师开导，她们也“颇知义理”了。当陶赴试并被诬下狱后，二鬼给他送饭，并赴院申理，遂使陶获释出狱归家。其中两鬼亦备受艰辛，小谢脚受伤，秋容被黑判摄去幽囚。经过一番曲折，他们得以团聚，“情同伉俪”，但始终无越轨同寝。小谢、秋容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行为，感动了一个道士。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遂用仙术先使秋容借郝氏女尸还阳，又使小谢借蔡氏之妹尸还阳，方才结为夫妻。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都是容貌绝世、品质纯净、聪明痴情的女性，她们蔑视封建礼教，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作者在这里还赞扬了陶生与小谢、秋容之间的平等关系。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简练，形象生动。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并饱含深情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蒲松龄的这一篇小说在这里能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明这一篇小说从思想到内容到人物描写和语言文字等都是很好的，它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佳作，它在我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马介甫》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河北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名叫杨万石。杨非常害怕老婆。杨的妻子尹氏，非常强悍，杨稍微触犯了了她，就要挨她鞭打。一天，杨在府城里等候乡试时遇见了马介甫。从此，他们交往越来越亲密，便结拜为弟兄。在交往中，马介甫得知杨妻尹氏横蛮地欺侮和摧残杨家的老老小小。因此，马对杨家老小深表同情，于是，他就施种种小技，帮助杨万石制服这个悍妇。但是，每当杨万石看到老婆的气焰稍微收敛一些时，就不照马介甫说的办法去做，或者向悍妇讨好献媚，或者向悍妇泄漏真实情况。当悍妇一次又一次地知道事情的真相时，便认为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因此，在马介甫离开杨家老小之后，她仍然轻视他，嘲弄他，辱骂他。没过多久，那悍妇的故态完全恢复了。读罢这则故事，大概是因为作者对杨万石怕老婆和对这个悍妇的横蛮、凶残描写得淋漓尽致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

个性斗争，此妇虽坏，然是突出典型。

读过这篇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蒲松龄笔下的杨万石的老婆，是一个心肠狠毒的女人。然而从小说描写的艺术上来说，她又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从这段批语中，我们仿佛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作者刻划人物艺术的称赞。

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白莲教》的小说，说的是白莲教的首领徐鸿儒，得到了一部旁门左道的书，能够役使鬼神。略微试了一试，看到的人无不惊异，奔走在他们门下的像一群鸭子争先恐后地来了。于是暗地里图谋不轨，便拿出一面镜子，说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终身结果。挂在厅堂上面，叫人自己去照，有时是一顶平民所戴的幞头，有时是一只贵人所戴的纱帽，有时是一袭大官所穿的绣衣，所戴的貂蝉，出现的形象很不一样，人们便更加感到惊异。因此到处传播，登门求见的，挥着汗珠络绎不绝的来了。徐于是宣称：“凡是镜子里出现的文武官员，都是如来佛祖注定要参加龙华会的人。各自应该努力，不要退缩。”便拿镜子自己来照，只见冕旒龙袍，就像一个帝王。大家互相看着，大吃一惊，一齐拜伏在地。徐于是造起旗帜，拿起武器，莫不踊跃相从，希望能和他在镜中出现的形象一样。没有几个月，聚集的人马以万计，山东的滕县、峄县一带，听到风声，就倒向他一边了。

后来，朝廷派了大兵来围剿，有一个彭都司，济南地区长山人，武艺和勇力都超过了别人，徐派了两个垂着头发的少女出来应战。两个少女都拿着双刀，骑着大马，刀白如霜，马嘶若怒，轻快迅速，周旋进退，从早到晚，两个少女没有能够伤害彭都司，彭都司也没有能够打败她们。这样打了三天，彭觉得精力俱竭，气喘吁吁地死了。等到徐鸿儒杀了，捉到徐的同党拘系起来拷问，才知道刀乃木刀，骑乃木凳，假的兵马战死了真的将军。

这篇小说写得虽然很离奇，但它说的是与农民起义有关的事，所以毛泽东很喜爱看。看了以后，他还提笔写下这样一条批注：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写的这段批注，虽然文字不长，但对作者和作品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小说中虽然故事写得很离奇，但作者对封建主义的表现是很明显的，这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尽管是这样，毛泽东从这篇小说的字里行间还看到了作者同情农民的心理倾向。在封建社会里，作者能有同情农民的心理，并且还能将这种心理公开地渗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都是值得称道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作品所表现的这种积极的社会意义是分不开的。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细侯》的小说，写的是浙江昌化一个姓满的书生，在杭州教书，偶然到街上去走走，经过一所靠近街坊的阁楼时，忽然有一只荔枝壳掉在他的肩上。抬起头来一看，一个年轻的女子靠着阑干站在那里，姿色妩媚，十分美好，不由得凝神注视，心动情摇。那女子俯着身子往下一看，微笑着进去了。一打听，原来是妓院里贾家的养女名叫细侯。她的声价很高，满自己想到无法如愿以偿。回到书房里冥思苦想，整夜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他拿了名片来到妓院里，见到细侯，两人说说笑笑，十分开心，于是更加被她所迷惑了。他假借别的事由，向他的好友借了一笔钱，带到细侯那里去，得到极其殷勤的招待，便在枕上口吟绝句一首赠给她云：

膏腻铜盘夜未央，  
床头小语麝兰香。  
新鬟明日重装凤，  
无复行云梦楚王。

细侯皱着眉头说：“我虽然出身卑贱，常常希望找到一个同心同德的人托以终身。你既然还没有娶亲，看我可不可以给你做个当家的？”满非常高兴，再三叮嘱她要坚守盟约。细侯也很高兴的说：“吟风咏月的事，我自己认为也并不难。往往没有人在的时候，也想学作一首，恐怕不一定就好。如果能够嫁给你，希望能指点我啊。”顺便问了问满：“家里有多少田产？”回答说：“薄田五十亩，破屋几间罢了。”细侯说：“我嫁给你以后，希望常常生活在一块，不要再出去教书了。种四十亩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十亩黍，织五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多了。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书，我织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句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

毛泽东的批注就是在读了满生和细侯这一段对话之后写下的。毛泽东写的批注是：

资本主义萌芽

后来满生和细侯的爱情又经历了一番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他们终于不改盟约，破镜重圆。

这里，毛泽东写的批注虽然仅6个字，但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小说，看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读历史，他把《聊

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历史来看，这是毛泽东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对于这一点，笔者后面还要作具体介绍。

毛泽东批读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9 月出版的这部《聊斋志异》，大概是 1955 年 10 月之后。此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聊斋志异》中一个个谈狐说鬼的传奇故事，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读得烂熟，到了年过花甲之年，他还一直如此有心境，还如此又读又批，爱不释手，充满浓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聊斋志异》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在管理图书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古典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进步性思想倾向的作品，都是很有兴致阅读的。《聊斋志异》虽然主要是写狐写鬼的，但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一些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对《聊斋志异》中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作过评说。1939 年 5 月 5 日晚，毛泽东专程到“鲁艺”去看望刚从国外归来的老同学萧三，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高陶著《天涯萍踪——记萧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7 页）1942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与“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教师的谈话中，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何其芳文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3 页）毛泽东还曾说过：《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小谢》是《聊斋志异》中表现人与人之间民主平等关系的代表作。到了 50 年代，毛泽东在重读这篇作品时仍然那么有兴趣，称赞它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和平等的”。毛泽东直到年过古稀，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还称赞《聊斋志异》写得好。他很有感触地说：“《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与读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常常是这样带着感情阅读并从中挖掘出强烈的积极的思想价值。例如，他在阅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中华书局印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时，曾带着感情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无论是读古典小说，还是读古典诗词，对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主性或进步性的思想，毛泽东总是这样加以肯定。这是毛泽东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通过一个个人鬼狐自由相恋、自由相爱、自由结合的爱情故事，塑造了诸多的妇女形象，从非常广泛的范围内真实地反映了妇女的悲惨遭遇和苦难的命运。作者以其锐敏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概括力，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而且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所主张的自由相爱、人与人之间民主和平等的思想，表达了作者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人鬼狐相恋、相爱的故事，就如同是作者精心绘制的一幅幅以妇女的觉醒和对种种封建礼教的反抗为主题的精湛的图画。所以，毛泽东在年过六旬的时候，重读这部鬼狐传奇小说还是那

---

《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样情感真挚，留连不舍。

第二，《聊斋志异》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广泛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聊斋志异》，是因为该书中的一个个人鬼狐自由相恋、自由相爱以及他们热烈追求幸福生活的爱情传奇故事的吸引，那么后来，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对《聊斋志异》还难以释手，一读再读，就不是因为一个个鬼狐传奇故事的吸引了，而是因为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清代初期的时代社会风貌。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殁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是我国清代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其代表作就是《聊斋志异》。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长达几十年。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深刻的感受，他熟悉农民的心理、愿望、风俗、信仰。他的思想感情有和农民相通之处。《聊斋志异》所描写的有许多都是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的事。一个个故事就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生产和生活的一小片投影。蒲松龄构思和创作《聊斋志异》，是从社会基本结构——家庭写起，从封建家庭内的夫妇妻妾、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公婆妯娌直到族中乡里、朋友宾客等，甚至妻妾争宠、兄弟和睦、姊妹易嫁、继母虐子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历史而具体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关系。如果说一个故事就是清代初期社会生活的一隅，那么，全部的《聊斋志异》，就是再现清代初期生活的一幅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世相纷呈、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它非常清晰地向人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宗教信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聊斋志异》还以鲜明的人民性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豪绅污吏之间的关系，活生生地描画出平民被贪官虐吏勒索宰割、搜刮蹂躏的真实情景。《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诸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一个个不同的命运和悲惨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

纵观《聊斋志异》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中大多数故事都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基调。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一方面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1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正因为《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而且越看越爱看。

第三，《聊斋志异》的文学艺术价值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除了作品具有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之外，还与作品独特的写作艺术和语言艺术是分不开的。

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1939年在延安时，毛泽东与他的同乡同学萧三的一次谈话中就作过评说。他说作者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里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萧三：《窑洞城》）《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作

者的本意不在写鬼狐，而是借谈鬼抒发孤愤之情，通过拟人化的鬼狐社会活动以及它们的言谈话语来阐发自己的主张和人生理想。因此，作者描写的“鬼”、“狐”有的比人还可爱，而且很通人情，很会讲道理，对于这一点，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孙一珍写过这样一段评述：“蒲松龄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并不突出其物的属性待证，而是把它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寓意深远地摹写了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遍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如《狐谐》中人称‘狐娘子’的女主人公，一直没有露面，当然谈不到什么肖像描写，但是她那伶俐的娇音，诙谐的谈吐，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谈笑风生，若不经意，把那几个轻狂的客人，奚落得目瞪口呆。从而使一个爽朗、幽默、才华洋溢的女性形象脱颖而出。《青凤》中的青凤，尽管点出她是个怕犬的狐狸，终究还是把她当作大家闺秀来写的。她美丽、聪明，对爱情有着向往和追求。然而她又显得那么拘谨、矜持、温情脉脉。”（孙一珍：《聊斋志异》，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3页）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一文中也有评说：“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

《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众多，但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掌握和描写，做到篇篇有新意，人人有特点，个个有个性。描写的青年妇女达几十名之多，不仅个个都是那么漂亮、聪明、热情、可爱，而且性格彼此各不相同。对人物的描写，文字也都十分简练，往往只用几个字就把少女的美丽、伶俐等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语言艺术方面，《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短篇小说集中，也以简洁、精练著称。有的学者说，蒲松龄在语言上锤炼得具有千金不易一字的功力。例如《红玉》这一篇，作者只用了32个字，就把冯相如和红玉月夜初逢，一见钟情，彼此默默无言而又心心相印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维妙维肖！《罗刹海市》的开篇，作者只用了39个字，就把人物的姓氏、身世、外貌、衣着打扮、性格和爱好等刻画得栩栩如生。《聊斋志异》在语言艺术方面，除了以简洁精练、形象生动著称之外，同时还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作者凝练的文字，卓越的语言技巧，笃厚的文字功底，使得《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更放异彩！

创作艺术的独特，语言艺术的高超，使毛泽东对《聊斋志异》一直青睐之至，暇不释卷。

毛泽东最爱读《聊斋志异》，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上列举的三个方 面，只是从作者和作品的方面来分析的，就是这方面的分析，笔者自知也是非常浅薄的。实际上与毛泽东本人的因素如理想追求、文化素养、性格爱好等也是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非常爱读中国历史，把阅读中国历史作为认识和了解中国过去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毛泽东也很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唐诗、宋词和中国古典小说，这是他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重要的途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著，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因此，它博得毛泽东的喜爱，这是很合逻辑的。如果毛泽东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东西再好，也是很难引起他的兴

趣的。对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笔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这大概是很多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这部名著，毛泽东到底是怎样阅读的呢？这知道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了。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一样，是多视角的。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条件或不同的内在要求，阅读的视角是不同的。这是毛泽东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

那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阅读《聊斋志异》的呢？

历史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与何其芳等谈我国的古典文学，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这是毛泽东对《聊斋志异》的一种评价，也是他读《聊斋志异》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往后的岁月，尤其是晚年的岁月，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差不多都是把它当作清朝的历史来阅读的。对于这一点，从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在50年代读《白莲教》、《小谢》、《细侯》这三篇小说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拿读《细侯》这一篇来说，《细侯》作者本来描写的是家境贫困潦倒的满生与妓女贾氏细侯的一段相恋、相爱的故事，可是毛泽东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读《白莲教》这一篇，看到了“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很显然，他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

在与何其芳等的这一次谈话中，为了表明他的上述看法，他还以《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这一篇故事为例，他认为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他说：“《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它描写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以至冥王都是贪污受贿，不问是非曲直。阴间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对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因而冤枉死的人来告状，不但不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结论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其甚于阳间。”（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2页）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的代表作之一。席方平是人名，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故事说的是：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与同乡富户羊某有过一些不和。这位姓羊的富翁死了之后，席廉得病，在生命垂危时对人说，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他，最后席廉浑身红肿，惨叫着死去。父亲惨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呆如痴，他发誓说：“我要到阴间为父伸冤。”果然席方平的魂魄离开了身体，来到了阴间之后，远远地看见他父亲在向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听了父亲的诉说，更加痛恨狱吏，遂写好状子，向城隍（在旧社会里，被说成是十分正直的地方阴司官）告状。城隍因受了羊某的贿赂，看了席方平的状子后，硬说席的控告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席方平气愤至极，继续往上告，告到郡司。由于郡司也受了贿赂，他不但不受理席的状子，还将席痛打一顿，仍将此案交城隍办理。席方平只好又回到城隍辖区，尝尽了械梏之苦，而不能伸冤。城隍怕席再告状，就派人将席押送回阳间的家。鬼差押席到家门口就走了，席又悄悄回阴司，状告到冥王那里。谁知冥王偏袒城隍和郡司，不容席诉说，就下令打他二十大板。席方平厉声问道：“小人何罪？”冥王仿佛没有听到。席在酷刑下愤愤不平喊道：“我

是该打的。谁叫我没有钱！”冥王更加发怒，叫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冥王问他还敢再告吗？席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冥王听后更加大怒，又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子锯成两半，席疼痛难以忍受，却硬是一声不吭。行刑的两个鬼卒大加钦佩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鬼卒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他的心，锯子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不一会儿，身子被劈成两半。冥王问席还告吗？席怕再遭毒刑，便谎说，不告了。冥王立即叫鬼差把他送回阳间。

席方平回到阳间，他想阴间的黑暗比阳间还厉害。可是他还不死心，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再告。他听说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亲戚，聪明正直。于是席又重到阴间去找二郎神。席到阴间又被冥王的鬼卒抓住，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哭啼不吃奶，活了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遇上了玉皇大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了阳寿三纪（古代的一种计时方法，一纪为12年）。

《席方平》这一篇，毛泽东读得很熟。他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还常有声有色地给身边的同志讲述这个故事。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身边的同志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从历史的视角读《聊斋志异》，把《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条主要的方法，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聊斋志异》是着重于看故事，那么，后来的岁月，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笔者认为，就是着重于读清朝社会的历史了。

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聊斋志异》不是兵书，也不是战略战术的专著，毛泽东怎么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阅读的呢？

为了说明毛泽东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里，笔者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在60年代初与何其芳的一次谈话。

时间是1961年1月4日上午，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丰泽园住地的颐年堂。大约在1959年4、5月间，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工作落实到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大概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说明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以便引导读者结合实际更好地阅读。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

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毛泽东看了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毛泽东在与何其芳谈话时说：“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接着，谈话就转入正题，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笔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说完《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7页）

这次谈话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将修改稿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值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间隙，毛泽东又一次审阅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并且在这个修改稿的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亲笔加写了以下一大段话：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今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除了加写的这一大段话之外，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修改稿还有两处重要的修改。一处是，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增写了：“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开了吗？”另一处是，序言中原话是这样写的：“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看了这段话之后又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又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两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地又一次约见了何其芳。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说着，他还把他自己添加的上述那一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其他在座的几位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要何其芳再增写几句，讲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9—130页）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本书序言中说：“这里选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着重描写人的勇敢，描写他们对于鬼怪无所畏惧，而且敢于打击它们，因之或许更多地表现了战略上藐视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来说明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密切结合的必要的。”《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许多个妖、狐、鬼的故事，如同《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许多故事一样，既表现了战略上的藐视，又描写了战术上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就拿《妖术》这篇故事来说吧。这个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说他三天就死的预言，没有受到讹诈。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无警惕的。到了第三天，他静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便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一个荷戈的“小人”来杀害他，他用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一个纸人。接着又一个狰狞如鬼的怪物来了，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一个土偶。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与檐齐的巨鬼，它一推窗子，墙壁都震动得要倒塌的样子。于公怕房塌被压，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因为他会武术，这个巨鬼终于被他打败了，原来是一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术的准备，他不是就会被那个算卦人派来的鬼怪所杀害吗？这个故事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视它，敢于打击它，敢于战胜它，鬼就怕人了，鬼就必然要失败。

说到毛泽东从战略的视角读《聊斋志异》，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趣闻：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他那如同我国历史文化知识库的大脑里立刻又浮现出了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我国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说着，他就很有兴趣地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

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又强调说：

《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他说：

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风趣的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注明“笑声”二字的就有六处之多。毛泽东认为，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在这次讲话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与周恩来、陈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了上述“狂生夜坐”这个故事。在毛泽东看来，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相信，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他不仅在看故事，而且在看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在阅读过程中，还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由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既联想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又联想到中国国内的种种魔鬼残余。他把《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50年代，60年代，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之所以那样用心，那样津津有味，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斗争的视角。从生产斗争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特点。在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家中，在农村生活时间最长、对农民最熟悉、最了解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了。蒲松龄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农村度过的。因为他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不仅亲眼目睹了风、雹、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在农村造成的种种悲凉凄惨的情景，而且还亲身经历广大农民预防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种种的生产斗争的实践。他不仅熟悉农村，了解农民，而且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学习、掌握了许多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的描写，既是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剪影，也是封建社会我国农村和农民从事生产斗争、生活习俗、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宰杀等各种知识和经验的实录。它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知识丛书。毛泽东说过：“《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的史料”，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史料，也包括生产斗争的史料。

《聊斋志异》中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毛泽东常常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来阅读《聊斋志异》。

就以毛泽东读《狼三则》这篇故事来说吧。这篇故事包括三则小故事，

都写的是屠夫与狼的斗争。第一则，写一屠夫被狼追着，他用卖肉用的铁钩子把肉挂在树上，狼缘树求肉，结果“钩刺狼腭，如鱼吞饵”，缢死于树。第二则，写一屠夫依靠场边的麦垛，先杀死面前的一只狼，又杀死麦垛后边正在打洞的那只狼。第三则，写一屠夫以窝棚为掩护，用小刀割开狼伸进来的前爪，用吹猪的方法置狼于死地。这三则小故事，都是写屠夫运用自己的生产知识杀死贪欲很强的恶狼的。这篇故事，毛泽东早就读得很熟。据何其芳回忆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和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谈到了《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这篇《狼》中的第三则小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

何其芳回忆说，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笑着对他们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3页）这是毛泽东对作者蒲松龄的称赞。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屠夫宰猪一定是见得很多的。正因为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写出了这样令人爱读的故事。

类似《狼》这样含有生产斗争知识的故事，《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去加以理解，把小说当作生产斗争知识来读，从阅读这些故事当中来学习生产斗争知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视角。我们知道，名震中外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大约从30岁开始，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写成的。它是蒲松龄一生殚精竭虑之作。《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除了作者长期的农村生活基础和创作才能外，与他大量地调查研究和自觉地长年不懈地搜集写作素材是分不开的。

清代以来，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传说颇多。传说他在塾师教书之余，专门从济南移植“白玉垂丝菊”，精心制做“蜜饯菊桑茶”，用驰名的柳泉水沏泡，招徕远近往来行人说故事。山东潍县年画界有一位有名的画商“年画张”，对蒲松龄极为敬重，两人友谊很深。“年画张”每年腊月进画，卖画，或者春天去江苏扬州、姑苏一带搜集画稿或购买雕板优质木材，都要从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经过，一年中要往返好几次。“年画张”知道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就主动帮助他搜集民间故事。因为他走的地方多，听到的传说和搜集的民间故事也多，而且他还自己动手帮助蒲松龄修改、创作。据传说，有一天早晨，“年画张”给蒲松龄讲了三个民间故事，带来两篇搜集稿，一下子就提供了五篇创作素材。恰好这一天李希梅又带来了由济南、曹州朋友处寄来的两篇。这样，蒲松龄在一天中就搜集到七篇故事和素材。

（“年画张”的材料见臧红星、王赤生编《蒲松龄轶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对蒲松龄的调查研究和搜集民间资料，我国的有关史籍中亦有记载。最为详细的，大概要数邹弢著的《三借庐笔谭》卷六中的一段：“相传先生居

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辰，携一大磁罍，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据载，在辽宁金县人民口头上也有这种传说，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写不下去了，就煮了一锅绿豆汤给南来北往的人歇脚，解渴，说故事。他把故事听多了，品透了，再回去写。这回可跟以前大不一样，“那笔就像捅着泉眼了似的，一溜两行的字儿，自己就冒出来了。”（《蒲松龄的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6期）

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浙江的一则传说更为奇特。说蒲松龄的长相和钟馗差不多，一脸落腮胡子，“心地却是一潭高山泉，一清见底，肚才也好得出奇出异”。传说他本来考上了状元，只因皇帝以貌取人，嫌他长得丑，没取。在他落第回家的路上，有个驼背老大爷，给他讲了马骏（驥）飘海到罗刹国的故事，于是蒲松龄回去写了“花面相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从此搜集一篇写一篇，写成了《聊斋志异》一部大书，并且传说连怎样搜集民间故事，也是这个驼背老大爷教他的：要在四个字上下功夫。这四个字就是“甜、酸、苦、辣”。

甜，是嘴要甜，对人要和气，称呼要好听，“男女老少都接近，故事多得写不赢”！

酸，是心肠酸，说故事的人伤心，搜集故事的就得流泪，“要是长了木头心，故事好能动人心”？

苦，有两重意思：泡壶苦茶给讲故事的人喝，给他润喉；另外还要做到：“十冬腊月不怕冷，大暑炎炎不怕热，无衣无食不怕苦”！

辣的地方要辣，不要怕伤人，辣了能醒人！

据说从此蒲松龄真的按老大爷的教导做了，听了一辈子故事。因为天下的奇事太多了，到死也写不完，所以蒲松龄死的时候一只眼未闭。（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上述这两则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事。但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说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和搜集资料工作的，人民给予蒲松龄的智慧和力量，蒲松龄从人民中搜集了创作素材，汲取丰富的经验和营养。

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素材的来源和搜集，蒲松龄本人在《聊斋自志》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以上简略的介绍足以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是因为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工作的结果。正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对刚从国外归来的诗人萧三说过的那样：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狐狸精来呢？（《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故事，而且从

故事的字句中间看到作者所做的大量的深入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搜集材料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这个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到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很注重调查研究的人，并且长期在身体力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调查研究的产物，《聊斋志异》中凝结着蒲松龄调查研究的实践。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此有无联系呢？

以上谈及的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视角，仅是笔者根据毛泽东读书的实际所归纳的主要的视角，它是笔者的主观之见，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视角。

《聊斋志异》是一部荟萃中国文史典实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无论从作者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艺术、语言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来说，《聊斋志异》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更爱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去理解、去汲取、去运用，所以在几十年中，他一读再读，越读越爱读。

笔者知道，从 50 年代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一直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办公桌旁还放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毛泽东终身爱读《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一直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如今，毛泽东已经离去，然而，他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聊斋志异》，还一直存放在中南海他的故居里，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后 记

今年 12 月 26 日，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 103 周年。在深切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时候，作为曾经直接为他老人家服务过的我们来说，心情更加不能平静，更加思念这位最受我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导师。

我们是为晚年的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自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几个有关的同志还像往常一样，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生前阅读批注过的数万册图书，依然每天进出在他曾工作生活长达 27 个春秋的中南海故居。故居的主人虽然随着流逝的岁月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每天每时，当我们走进故居，看到故居的主人生前用过的一件件遗物，一直很喜爱的一册册字帖和一件件古今著名人物的字画，整理抄录他生前读了又读而且写了许多批注文字的一册册图书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不由地就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和已经过去的一件件往事，仿佛他仍在我们身边。毛泽东是已经离开我们，而且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我们的心理感觉好像似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他老人家仍是那么神采，仍是那么慈祥，仍是那么幽默，仍是那么令人敬仰、令人心折、令人崇拜。他老人家还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

毛泽东博览群书，终身酷爱读书，特别是在耄耋之年和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还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常常不分昼夜地读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眼见耳闻和自己亲身经历与做过的一件件往事，还都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间。如果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什么最大嗜好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就应当说是读书学习。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中，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离开北京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期间，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都要坚持读书。进入 70 年代，特别从 1971 年“9.13 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全心有

余而力不足了。唯一的每天能坚持的活动就是读书。生病发烧了，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不读书，可是他还天天带病坚持读书。腿病不能站立、不能走路了。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也要读书；眼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大字本的。从1973年底到1976年初，他先后看了几十种数百万字的大字本书刊。没有大字本的，就用放大镜一行一字地看。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两眼全不能看书了，每天还要让身边的同志给他读书。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已经无力说话了，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正如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曾说过的那样：“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是按阴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计算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有人曾经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比作是书籍的海洋，这是因为在他的住地到处都放着书，连厕所里和睡觉的床上都摆放着书。进城以后毛泽东一直睡的都是双人木板床，床上除了躺下一个人的位置外，其余的地方全放的是书。与其说毛泽东是睡在木板床上，不如说毛泽东是睡在书籍的海洋里。毛泽东是一位很喜爱在长江、大海里顶狂风、战恶浪的游泳高手，也是一位生命不息、在书籍的海洋里孜孜不倦、采撷不止，从来没有满足过的求知者。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记载着各种知识的书籍。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存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各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许多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一生中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是很少有大学问家可以相比拟的。是图书一直陪伴着毛泽东，还是毛泽东一直陪伴着图书，反正生活中，毛泽东的身边不能没有书。中南海故居里存放的数万册图书，有的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在湖南上学时读过的，有的是延安时期读过的，更多的是建国以后阅读过的。有的书上有毛泽东本人的亲笔签名，有的书上盖有毛泽东的印章，有的书上还写有许多的批注文字和圈划的种种符号。这一册册的图书，一直伴随着毛泽东。它们是毛泽东读书生活最真实的记录，也是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珍贵的资料。

《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读得烂熟。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他还一直爱不释手，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在病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时常很有兴致地和身边的同志一次又一次谈论和评说。如果把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比作是人生行进的万里历程，那么，他阅读和批注过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就可以说是这万里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耀眼的光环之一。它虽然仅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但从中我们也能约略地看出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倾心追求知识的精神是多么令人钦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的批注、评论和轶闻趣事，将会随着这五部小说的流传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今人和后人中千古传诵。

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了华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草拟过程中，摘引了逢先知同志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的有关的原始记录，也参考了一些同志的有关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谈及的一些史实，仅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记录或个人的记忆，有的不一定准确。一些观点或评说，

也仅是笔者的粗浅之见，有的可能也不尽妥当。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正。

愿这本小书能伴随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愿这本小书能增添您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点了解。

愿您从这本小书中能得到一点启示。

徐中远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北京

